

目 录

历代名人与西安

宋太祖降京兆府为“次府” (3)

蔡京和童贯为官永兴军 (4)

学术交流

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上) 王 晖 (5)

志书质量的全程控制 王铁鹏 (9)

人物春秋

石鲁 (14)

聂树人 (15)

史料钩沉

古代周至进士考录(一) 任 升(16)

新中国接受国际救援的曲折历程 (20)

元代皇帝为何无陵墓 (23)

西安风情

西安古城墙之清西安城军事布防 (24)

唐长安花市 (28)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中华老字号“德发长” 富小云 整理(30)

文史拾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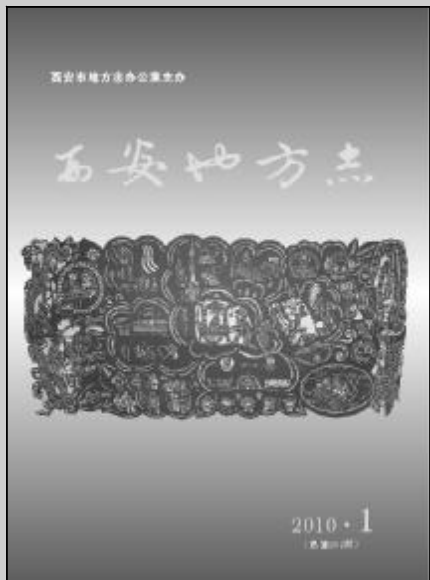
古代的公费医疗 (22)

孔子在川上叹什么 (31)

嵇康嵇绍两父子 (32)

典故里的虎 (33)

朱元璋的忆苦饭 (35)



西安地方志

2010·第1期

(总第202期)

陕新出内印字 0057 号

内部交流刊物

工本费:10元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孙亚伟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委员:王莹 张耀 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姚敏杰

副主编:张耀

责任编辑:王文竹 宋亚颖 杨栋梁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二府街27号

邮编:710003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Ve.xdwy.com.cn/difangzhi

E-mail:zhangyao55@sohu.com

电话:029-87296801

贺卡今昔	(36)
史上那些嗜酒的文人	(37)
毛泽东曾用过的二十六个名字	(40)
岁时节日的变迁	(43)
古今中外的“四菜一汤”	(46)
花木兰参军没必要女扮男装	(48)
宋朝的“几乎赏”	(49)

志鉴动态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业务培训会召开	(50)
西安地情网正式开通	(50)

知识窗

古人的鞋子为何鞋尖上翘	(8)
古代的“秘书”	(31)
“八字还没一撇”的真实来历	(34)
中国结的来历与含义	(42)
“中彩”的来历	(48)
汉代也有兵马俑	(49)
长寿的雅称	(51)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来历	(51)
我国最早期报纸的投递与发行	(52)
如何区分佛教的服饰	(53)
“奏折”之误	(53)

理论研究

制约二轮志书整体质量提高的三个关键问题	高金山 (54)
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创新谈	王登普 (55)

历代诗人咏长安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李贺 (56)
-------------------	---------



宋太祖降京兆府为“次府”

宋太祖(927~976年),姓赵,名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原为后周掌管装军的殿前都点检,后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公元960年,发动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兵变,夺得后周政权,自立为帝,国号宋,都开封,史称北宋。

宋太祖称帝后,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先攻灭南方的割据政权,对北方的辽则取守势。在内政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禁军宿将和藩镇的兵权,州郡长官统由文官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之互相牵制;而且三年一替,使之无法积蓄力量,与朝廷相对抗。宋太祖时,长安称永兴军城,是京兆府治所在地。由于当时军、府合一,故又有永兴军府的名称。

宋以后,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降为“次府”,但宋太祖对长安的地位相当重视,表现之一是在开宝六年(973年),特令皇弟赵光义为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开宝九年(976年),太祖卒,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仿效太祖之制,也以皇弟赵德昭为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并封之为武功郡王。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卒,其子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这一年,真宗分天下为15路,置陕西路。这是“陕西”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其辖境约当今陕西和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地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路治在京兆府永兴军城。



蔡京和童贯 为官永兴军

北宋末期,统治阶级荒淫腐朽,朝廷政治极为黑暗,号称“六贼”的奸臣权势显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六贼”中,有两个人曾为官永兴军,他们是蔡京和童贯。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此人善于投机钻营,早年追随变法派,后又迎合司马光,见风使舵,作恶多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他知永兴军,历时半年。此后勾结童贯,步步高升,10年后爬到右仆射的高位,再任太师,向被视为“六贼”之首。

童贯(1054—1126年),字道夫,东京(今河

南开封)人,宦官。曾主管苏杭造作局,为宋徽宗搜刮奇珍书画,深得宠幸。大观元年(1107年),永兴军府力争为大都督府。政和五年(1115年)童贯为西北监军,领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河西六路边事,总领六路经略安抚使。此人熟于迎合皇上,镇压人民,对于军事一窍不通。监兵西北,立即在永兴军抽选兵士2000人赴泸南(今四川泸州)镇压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次年正月,童贯又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不到3年,领院事,称太傅。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根据蔡京、童贯等人的建议,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只称京兆府,一称京兆郡。“永兴军城”的名称使用到此为止。

蔡京和童贯为官永兴军,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他们的苛剥和贪婪,人民深受其害。徽宗崇宁年间,京兆府13县只有民户23万多,人口53万多。当时有民谣说:“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声。



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上)

◎ 王 晖

提要：本文从8个方面对第二轮志书编修的体例模式进行总结和思考：1.志书体式多元概念不适合多种志书；2.断代志中建置志可分解到环境志和政府志中；3.上级机构应当从附录上升到独立专志；4.三大国策入志要全面协调，体现科学发展观；5.基础设施篇设置不合理；6.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科学设置人物志；7.按《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科学处理限外材料；8.约定俗成的专(分)志名称不应更改。

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展以来，省、市、县(区)三级志书体例都存在着几种共同的模式倾向，各有利弊，值得及时总结和深入思考。

一、志书体式多元概念并非适合多种志书

志书体式的概念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志书纵向结构上出现章节体、纲目体、类目体、卷目体、条目体、章节与条目结合体；横向结构上，出现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专志名称上出现专志、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分志。这些多元概念，有的是专指概念，不适合多种志书；有的提法本身就很勉强，有的根本不符合逻辑概念划分的原则，必须加以区分。

(一)纲目体、类目体、卷目体、条目体、章节与条目结合体。前四种体式是我国史志原有体例，方志文献中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类型，没有本质区别。比如说“纲题目文”，“大类为纲，小类为目”，一句话，纲是管

分类的，目的是统率资料的，这与条目体完全吻合。条目体不等于辞书那样一律平列，它也有大类与小类之分，因此，纲目体、类目体、卷目体说到底就是条目体。条目体是中国传统史志体式，很适合资料撰写。条目不冠序号，因为条目之间是并列的，没有统计性和第次关系。条目力求独立完整，应免去有序号的起承转合、前后照应的讲义式撰写方式。纯条目体式对于山水志和有些分类简单的志书是非常适宜的，但对于社会分工很细、科学分类复杂的省市级志书而言，用所谓“纲目体”(即条目体)就会弄巧成拙。如《××市志》，用了条目体，就出现几级纲目：“卷十五共产党 民主党派 社会团体”，再下设“中国共产党××市委员会”，再下设“党员代表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再下设“【代表大会】中共××市第×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五级目，怎么区分类别？哪一级是纲？领属关系看似清楚，间或撰写的志文

就不清楚了,特别是读者引用时不便注释。与其这样条目重叠、层次不明、领属模糊,不如引入便于检索的章节体模式,将第一、第二、第三级标题加上篇章体,最后两级依然是条目与子目,条目也无需加鱼尾括号【】,鱼尾括号是注释的标记,志书条目不是词条解释,去括号用黑体标目即可,子目用楷体区别正文,形成章节与条目结合体。“章节体这种体裁并不是从我国固有的纪事本末体发展而来,而是在西方著作体裁的影响下形成的。”章节体的引入,说明它在逻辑领属关系上有其长处,其弊端主要是在条目一级上不适合纪事本末体式撰写,很容易与讲义和教科书的形式相混淆。因此,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都引入章节体进行分类统目,在条目一级上又去序号保持纯条目体,这就是我们方志界所说的章节与条目结合体。这种体式兼具章节体与条目体二者优点,应该说是当前流行的有利于编纂的史志科学体式。现将上述纯条目体改为章节与条目结合体体式排列如下:“第十五篇政党(删共产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市委员会,第一节党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中共××市第×次代表大会。”

(二)中篇体不符合形式逻辑。志书分类横向结构上出现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笔者以为,只有大篇体和小篇体是科学的,中篇体是牵强附会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三章体例第十二条:“篇目设置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现行管理体制)、全志整体性与分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妥当。……标题简明准确,题文相符,同一门类各级标题不重复。”这一条

规定正是针对那种不尊重现实社会分工,不注意分志相对独立性,两级标题设置重复的现象,这在第二轮修志中表现十分突出。这就是所谓中篇体结构导致人为地将2~5个行业合并为一篇。以某县志为例,设立公安、司法、军事篇,硬是将司法局一家科级单位,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副县级单位,人武部一家正县级单位,五家合为一篇;而一个科级建置的教育又独立成篇,这六个单位在志中的地位严重失衡。中篇结构是造成标题重复的根源,常常是用几个种(下位)概念并列为属(上位)概念,也就是将几个章的标题并列为篇的标题,将属种关系简单化,造成篇、章同名的弊端。市县志不管分多少篇章,都在一卷(册)之内,多分几个平起平坐的专篇(章),既照顾社会分工的要求,又符合科学分类的规范,便于操作和检索利用,可谓一举多得。这些优点都是中篇体所不能比的。如果要体现整体性,在小篇上面再归并为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几大块,实行大篇体也是科学的。

(三)省市级志书可分一卷一志体与一卷多志体。志书分类横向结构上的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都是针对市县一卷体志书而言的,即在一本书中分大篇、中篇或小篇。而对于多册以上省市级志书,不能简单套用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概念。省市级志书都是数十卷上百册的,怎么能称其结构是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呢?省市级志书只有两种体式:一卷一志体和一卷多志体。例如《北京志·凡例》称“以卷统志”,即一卷统率数志。《北京志》整体设35卷,卷下共分107册,册下统154个分志。这就是典型的一卷多志体。第二

轮黑龙江省志篇目设计为 104 志,一志一卷,这就是典型的一卷一志体。可见,省市级志书只有这两种体式可分,县志的大篇体、中篇体、小篇体概念是无法描述省市级志书体式的。

(四)专志名称要规范统一。志书编纂是从各行各业编志开始的,工作中用语上出现专志、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分志等概念,对他们要有明确的界定,不能混用。“专志”应属于集合概念,包括所有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专门志和分志;“专业志”应当从学科角度上来划分,如《中国植物志》、《方言志》、《黄梅戏志》。“行业志”应从工作系统角度来划分,如《安徽省电力工业志》、《安徽省司法行政志》。“部门志”应从独立机构角度来划分,如《安徽警官学院志》、《上海图书馆志》,记述对象就是一个部门,不涉及这个行业系统。此外,各行各业在为总志编纂的同时,也出现编纂本系统的单独出版的小而全的行业志和专业志,这就要明确两个概念,为总志服务的专志应称分志,标题也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为总志服务的志名必须带总志名,如《安徽省志·司法志》;而独立出版的既有大事记、人物传、附录等体裁,内容上又有党政群团后勤等共性的内容,属于行业志或专业志,名称上与总志不发生关系,可以行政区域名加行业名,如《安徽省行政司法志》。志名不同,工作中使用起来就不会混淆。

二、断代志中的建置志可分解到环境志和政府志中

建置志是志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志,第二轮志书如何设置大有探讨的必要。

(一)断代志中的建置志失去历史沿革仅有现状难以独立成志。第二轮志书除了少数

志书是贯通古今外,基本上都是续修断代志,一般断限在 20 年左右。近 20 年来,国家政局稳定,行政区划变化不大,除了少数地市合并,以市管县,有的县改为区外,绝大部分省、市、县三级政权没有变动,没有历史沿革可言,因而,续修断代志,建置沿革志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已出版的市县志,有的为了保留建置沿革志的存在,在这个部分采用了通纪体的形式,将首轮志书的建置沿革完全照搬。如果说全志采用重修模式,都是将历史上的志书内容保留下来,那么建置沿革无疑也应该这样做;而一部第二轮志书其他分志都是从上一轮志书下限次年开始,唯有建置沿革志突破上限,全志的断限不统一,时空不一致,总是给人不协调的感觉。另外,市县志建置沿革志篇幅不重,一个篇章重复记载不明显,但对于省级志书,重复记载矛盾就凸显了。如首轮《安徽省志·建置志》有 180 万字,是首轮《安徽省志》78 册中分量最重的一册,若机械地重复记载到第二轮志书中是不现实的。所以说,第二轮志书的建置沿革志,要从实际出发,与相近的分志进行适当归并。

(二)区位面积内容可入环境志。建置沿革志中的区位面积,是一个地方的行政区划空间范围,尽管第二轮志书记述的时限内,这个空间范围没有变动,但还是要记入志书。假如说断代志要归并裁撤建置志的话,区位面积可以入环境志,因为区位面积本身就是境域,环境志记境域顺理成章。

(三)行政区划可与政府志的基层政权内容合并。就一个县而言,记述行政区划,内容是某某年设置多少人民公社,某某年设置多少乡镇;在政府志中记述基层政权,同样是记

●学术交流●

述某某年设置多少人民公社，某某年设置多少乡镇。这种重复在旧志中多不存在。我们考察旧志，旧志一般将建置志同舆地志并列，在旧志中真正做到了“大社会”、“小政府”，政府和行政区划除在建置志有所反映之外，政权主要记述衙署，也就是说只记述政府办公机构场所，至于政府官员，它又专设职官志记述。尽管这样做有分散之嫌，但并不重复。新志关于政府志的记述，都在力求强化政府的职能作用，记述政府建置沿革、政府组成、基层政权、政务纪略、领导人更迭等，很有意思的是偏偏不记述政府的办公场所，有的政府大楼作为标志性建筑被移到城乡建设志中记述。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政府志能不

能做重大变革？不妨来一个“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笔者认为，一个地方的政权设置，就是地地道道的建置沿革。第二轮志书建置沿革志内容单薄，难以独立成志，完全可以将其内容归并到政府志，既可作为基层政权，又可作为行政区划。而且来自旧志的启示表明，政府办公场所也应该作为政权志的硬件设施记述。比如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志书都记述过中国共产党初期建立的政权被称作“篮子政府”，意思就是指没有安全固定的政府办公机构场所。现在的政府所在地，是一地的政治中心，也是反映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在政府志中不应遗漏。（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地方志》2009.12）

·知识窗·

古人的鞋子 为何鞋尖上翘



鞋尖上翘，是我国古鞋的最典型的特征。史称，鞋翘始于先秦。南北朝时，鞋饰丰富，款式各异，主要也表现在鞋翘上。如：晋有凤头履、聚云履，梁有分梢履、立凤履、翁头履，陈有玉华飞头履，西晋永嘉间又有鸠头履。其中，凤头、立凤和玉华飞头履为妇女所穿，其他一般为男子所着。

此类鞋饰还可从唐诗中找到印证。如王涯诗曰“云头踏殿鞋”，元稹诗曰“金蹙重台履”。始于五代的尖足鞋，即“三寸金莲”，到了宋代，便产生了翘尖小脚鞋。明代受元朝服饰的影响，靴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明制严格规定了穿鞋等级，故一般士民仍以穿鞋为主，其制鞋水平的

提高也仍以鞋翘为标志。清代，女子普遍穿着高底鞋、“金莲”和圆头圆口鞋。男子除着靴外，所穿布鞋式样和现在相差不多。因此，清代鞋饰日趋形成“平头鞋”新格局。仅帝王达贵的靴鞋，鞋底前端略微上卷，并无明显的鞋翘状态。

清代以后，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以及蒙、朝鲜等族鞋饰仍保留着浓郁的鞋翘色彩。

古鞋何以会出现鞋翘？究其原因：一、中国古代男女服饰皆以裙袍为主体，鞋翘可用来托住裙边，不至跌滑。二、行走时鞋翘有警戒作用，使穿者免受伤害。三、鞋翘一般与鞋底相接，而鞋底牢度大大优于鞋面，当可延长鞋饰寿命。

志书质量的全程控制

◎ 王铁鹏

提要:志书质量全程控制是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质量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出版等方面作出规定的基础上提出的。志书质量全程控制,即对志书编纂、出版各个环节进行质量控制,包括篇目制订、资料收集、志稿评议、志稿审查、志书出版等5个环节,并对5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为确保志书的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国家关于出版管理法律、法规,在总结修志经验,征求各地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从志书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出版等方面,明确规定了志书的质量标准。目前一些省市开始考虑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出台不合格志书的召回制度,这对于保证志书质量十分必要。但如果能够在落实《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过程中,对志书编纂、出版的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即志书质量全程控制,充分考虑可能影响志书质量的程序性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把问题解决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既可以确保志书的质量,又可以避免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志书质量的全程控制,就是对志书编纂的各主要环节及过程进行质量把关,包括篇目制定、资料收集、志稿评议、志稿审查、志书出版等5个环节,通过

对每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确保志书的质量。下面,笔者根据自己在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的经历,对志书质量全程控制谈一点体会,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志书篇目制订过程的质量控制

志书的篇目设置、谋篇布局是修志的开宗之作,确定志书的框架和篇目是整个修志工作中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志书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篇目设置是否科学,分类是否恰当。而篇目质量高低,与制订者对所记述事物的认识水平、对志体的把握程度直接相关。因此,在拟订志书篇目之前,应对所记述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志书所记述事物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阶段的特征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同时,应对兄弟省市相关志书的篇目进行分析研究,学习借鉴相关志书篇目编排的长处,开阔设计思路。如果该志属于续修,还应

对前志篇目进行剖析,分析所记述事物发展

●学术交流●

变化的情况,找出不同点,作为续志篇目制订的依据。

制订篇目的过程,一般是首先拿出一个收集资料的篇目,按照篇目的框架要求收集资料,编纂初稿。篇目制订出来后不会一成不变,还要根据资料的收集情况,以及对所记述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作经常性的调整、修改、补充、完善,最终达到“书成目就”的目的。因此,对收集资料的篇目,既不要过多纠缠,也不可草率行事,一开始有一个大体科学、可行的篇目即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承编单位制订出篇目初稿时,应履行必要的论证、备案手续。论证人员应由志书承编单位、地方志工作机构、地方志专家以及所记述领域的专家组成,重点论证是否符合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相统一的原则,是否彰显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是否缺失要项或与其他志书交叉重复等问题。论证会应及时形成论证报告或会议纪要,以备查证。

篇目制订出来后,要经过志书承编单位编委会讨论通过,并报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地方志工作机构接到备案后,应予回复;如有修改意见,应在回函中明示,并提出修改意见,供承编单位参考。志书承编单位对篇目进行较大调整后,应将调整后的篇目及时报地方志工作机构变更备案。有的省市要求对篇目进行审查,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篇目尚不定型,且没有具体内容,很难作出审查决定,因此备案即可。

二、资料收集过程的质量控制

资料收集是地方志编修的基础性工作,资料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志书质量的优劣,

这是由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这一特性所决定的。资料的质量标准是全面、系统、准确、翔实,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全面、系统,就是要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要素齐全;准确、翔实,就是要求存真求实,资料的时间、地点、人物(单位)、事实、数据等要准确;代表性、权威性,就是要求注重使用突出地方、行业和时代特色的原始资料(或第一手资料)以及政府发布的统计资料。

为了确保资料质量,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要注意按照篇目设置和社会分工,全面、系统地收集资料。行政区域志要全面、系统收集资料,切忌只收集行政区属单位的资料,把行政区域志修成行政区属志;专志要全面、系统收集所记述工作或事业的资料。记述专项工作的志书,如财政志、税务志、审计志等,要注重围绕为履行工作职能而开展的各项工作的资料收集;记述某项事业的志书,如教育志、科技志、卫生志等,要注重收集本行政区域内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资料,避免把事业志修成部门志、单位志。要注意收集出现的新事物资料和最新调查、研究、统计成果以及口述资料、实物资料,不断丰富资料的广度和深度。

资料整理不是仅仅做誊清补齐、装订登记,高水平的整理表现在对资料的辨识、鉴定。在整理的过程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筛选、判断出最权威、最准确的资料,杜绝“假、冒、伪、劣”资料混入其中。高质量的资料,为确保志书的质量提供了保障。当然,如果遇到对同一事物(问题)记述有抵牾的资料,且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要匆忙予以肯定或

否定,可暂时多说并存,继续查找新的资料线索。

在资料基本收集齐备的情况下,以资料收集篇目为框架,修志人员便可着手编写资料长编。资料长编的编纂主要采取纂辑体的编纂方法,即将资料经过初步筛选后,按照已设计好的资料收集篇目进行编排,这种方法条理清楚,简便易行,能保持原始资料的面貌,存史价值高,是目前较为普遍采用的方法,它是由原始资料向志书过渡的“中间产品”。资料长编的作用有:一是及时检验资料,促进资料收集工作;二是有助于完善篇目框架;三是可以提高修志人员对资料的驾驭能力;四是便于审核志稿;五是有利于更多地保存资料。资料长编编纂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第一,资料选择宜专、宜实,紧扣主题,言必及事,忌用空话、套话和与主题无关的话;第二,在所列资料之后,必须详细注明资料出处,可用括号标出。若资料出处为某种书刊,则应注明出版单位、版本、页码、起止行次等,以便日后核对查找;第三,有些资料原文含义不清,时间、地点、称谓省略或有明显的错漏,编者要根据考证结果加以必要的说明。

此外,要特别强调,对入志的引文和重要资料,都应标明出处以供查验,这一点至关重要。首轮修志中许多志书的引文和重要资料都没有标明资料出处,这不仅影响了志书的使用效果,还大大降低了志书的权威性。因此,志书审查验收时,应把引文和重要资料是否标明出处,作为志书质量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源头上确保志书的客观真实性和权威性。

三、志稿评议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志稿评议过程的质量控制,是确保志书质量的必要环节。评议会的质量一般取决于参会人员的水平、能力、准备的程度,以及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评议会一般由承编单位组织,或由承编单位与地方志工作机构共同组织,参会人员一般由熟悉本地区、本单位情况的老领导、老同志,修志专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有条件的还可邀请兄弟省市的修志专家参加,特别是曾经参与志书评议的专家,或者是参与志书编纂的专家,这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邀请的专家要注意专业对口,根据志书内容和评议需要,可聘请民族、宗教、法律、档案、保密、统计和技术方面的专家。在邀请专家的问题上,还可以进一步拓宽思路,如《中国地方志》和《北京地方志》编辑部组织的2009年新方志编纂理论研讨会暨组稿会,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专家,从志书读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对志书内容和质量进行了点评,使与会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可以作为今后评议志书的一种尝试。参会人员准备得充分与否,与评议会的质量直接相关。志书应于会前两至三个月送到参会者手中。会议主办方应要求参会人员认真准备,写出书面意见,避免出现蜻蜓点水式的评议。如果邀请兄弟省市的专家参加,还应附送有关地情参考资料。

开好评议会的关键是要营造宽松氛围,使参会专家敢讲真话,敢于摆问题、挑毛病,这样才能达到评议的效果,切忌把评稿会开成评功摆好会。会上承编者、评议方讨论交流,形成互动,相互启迪,共同提高,这也是评

议会效果好于书面评议的原因所在。评议方要运用恰当的语言表述,避免产生埋怨情绪。承编者也要有宽阔胸怀,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每次评议会后,主办方都要写出评议报告,指出志稿的优缺点、主要问题以及修改意见,供承编者修改时参考。

四、志书审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志书审查过程是确保志书质量的关键环节。志书的审查过程一般经过“三审”,即初审、复审和终审。初审由承编单位编委会组织,重点审查史实、专业、保密等问题;复审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邀请专家参与,重点审查是否符合志体和志书编纂规范,把好史实关和政治质量关,并就志稿是否合格、能否报终审作出决定;终审则是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讨论志书承编单位编委会报送终审的请示,听取地方志工作机构审稿人员的汇报,重点审查志稿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的历史与现状,并决定志稿是否具备出版条件。通过审查后,应出具终审报告,并以批复形式下发承编单位。

在首轮修志中,形成的“三审”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应该坚持下去。承编单位编委会、责任审稿、副主审的审查,应该形成制度,并切实履行自身之职责。北京市从首轮修志开始,就制定了“三审”的审查验收制度,对每一部志书都确定1名责任审稿,安排两名《北京志》副主编作为副主审,负责该志从篇目设置到评议、审查验收全过程的质量把关。区县志由于体量大,设计内容广,质量要求高,除安排1名责任审稿和两名副主审外,还

聘请一些退下来的区县志办主任担任特邀审稿,对区县志质量把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把好审查关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承编单位编委会和主编,在志稿通过初审后,应分别盖章、签字以示负责,并上报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申请复审。其次,地方志工作机构,应确定志稿的责任审稿,明确主审或特邀审稿人,参与志稿的评议和审查。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应将质量把关的关口前移,从篇目设置开始,到撰写初稿、志稿评议、通过终审,甚至出版,进行全程参与和跟踪,这样可以较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全程跟踪志稿审查过程,负责指导和监督志稿的审查验收,同时做好复审和终审的组织工作。

五、志书出版过程的质量控制

志书出版质量是志书质量控制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志稿经过多次评议、修改和三审的过程,虽然进入出版社还要经过三审、三校,但往往容易忽视对质量的把关,从而省略一些审稿程序。承编单位这时候往往急于见书,经常在没有做到“齐、清、定”的情况下,就将志稿交到出版社,为出版过程的质量把关留下隐患。地方志工作机构终审后把志书送到出版社手中,也往往认为以后就是出版社的事了,容易放松对志书出版质量的跟踪。

把志书出版质量纳入志书质量控制的过程,应当明确志书承编单位、地方志工作机构、出版社的相互分工及不同责任。作为承编单位,送交出版社的志稿要达到“齐、清、定”。所谓“齐”,就是志稿在交给出版社时,稿件的所有组成部分要齐全,不缺不漏。稿件的正文

部分不缺页,志稿应该有的扉页、目录、凡例、前言、后记、名单、前插图、随文图及文字说明等齐全。所谓“清”,就是指稿件字迹要清晰,书写规范;图片要清晰,数码图片的像素(大小)要符合制版要求,不要以印刷品图片代替照片,不要用翻拍复制的照片,也不要把自己绘制的、不规范的地图、示意图当作原稿使用。所谓“定”,就是指送交出版社的图文稿件、文字内容和图片数量应是最后确定的。在出版过程中,除了原则错误、错别字,以及重要名称、数据有误必须修改外,一般不能再做较大的修改。另外,作者在阅读校对样时,也不可再大幅度的修改。

作为出版单位,要做好出版流程中的三审和三校。所谓“三审”,就是对书稿进行三次审读。书稿在进入出版社后,首先要经过三审。初审由责任编辑审读,提出初审意见,判断书稿质量,以及编辑加工后是否能达到出版要求;二审大多由编辑室主任承担,评估责编的审读意见,检查书稿是否有原则性错误;三审由总编辑、副总编辑或指定的资深编审完成,做最后评估、把关。所谓“三校”,就是书稿经编辑加工后交付排版,排版后进行三次校对,一次核红样,以消灭在排版、校对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出版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在志稿交付出版社之后,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应是“完事大吉”,而是应当积极了解志稿在编辑、校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志书的出版质量。志稿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出版社一般会安排作者单位参与阅改校样,对

志稿中的问题或讹误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志书是权威性资料书,请编纂者多参与把关,消灭或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差错。但作者出于追求完美,有的往往会对校样做大的修订,甚至会对篇章结构进行改动。面对如此情况,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必需出面干预,进行必要的协调,既保证志稿终审的权威性,又对志书的质量负责。志稿在出版社进行校对的过程中,除了主编和志稿编纂者审阅外,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有关人员也应同时审校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有二:其一,行使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能,为保证志书质量把关;其二,由于有关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指导修志,比较了解书稿的编纂情况以及其中的重点问题,可以提出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如此多一道手续,也是质量控制的必要手段。

总之,志书质量的全程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哪一个环节考虑不周,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志书出现质量问题。因此,应在总结志书质量控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完善志书的质量控制提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日程上,加强对志书质量的管理,确保志书的质量。

(摘自《中国地方志》2009.12)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后改名石鲁。四川仁寿人。自幼喜爱绘画,1934年入四川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7年毕业后入华西协和大文学学院历史社会系学习木刻创作。1939年入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曾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前锋剧团戏剧宣传股股长、戏剧导演。1940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先后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宣传股长、美术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创作员,《群众日报》、《群众画报》主编,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主任等职。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石 鲁

党。其间以创作版画为主,兼搞年画、连环画、新洋画片等,主要作品有版画《群英会》、《妯娌俩》、《打倒封建》、《说理》、《民主评议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北分会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并开始国画创作,其代表作有《变工队》、《侦察》、《移山》、《幸福婚姻》等。1954年任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全



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埃友协理事等职,同年创作《长城内外》。1959年写作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后被拍摄成电影上映。20世纪50年代石鲁和赵望云、方济众等人共同创立了“长安画派”。其代表作品有《打倒封建》、《埃及写生集》、《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延河饮马》、《东方欲晓》、《东渡黄河》等。同时,还出版《国画选》、《石鲁作品选集》以及美学论文《新与美》和绘画理论《学画录》等。石鲁曾多次出国访问和办画展,在国外有一定影响。

石鲁还担任过美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委、中国书法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等职,为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文化大革命”中石鲁受到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组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1982年8月在西安病逝。

聂树人

聂树人(1922~1987),陕西三原人。194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地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8年任西北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副教授。1949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教授、助理系主任、史地专修科主任,1953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系主任,1960年以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

其在区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所撰写的《陕西自然地理》、《陕西自然经济地理概论》、《西北的矿产》等专著,为陕西省及西北的工农业生产布局、发展和经济区域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聂潜心研究医学地理学理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医学地理学理论专著——《医学地理学概论》,填补了中国地理科学方面的空白。

聂先后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及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地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西安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陕西省中小学地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1987年8月病逝。



古代周至进士考录(一)

◎ 任 升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从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设进士科开始，到清末光绪31年(1905年)结束，历时1300多年。由于北方频战等原因，古代中国出现了特有的人才区域——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埋的是皇上。据史料记载，在这

1300年间，全国考取的进士约在11万名以上，全国三分之二的进士分布在江浙一带。全国千名进士县有18个，福建莆田多达1669名(包括武进士)，荣登全国榜首。陕西考取的进士约有2300名以上，周至县考取的进士记录在册的有36名，这

在西北是相当高的数量，充分显示了周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人才辈出。其中宋代的赵瞻、明代的王元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一、宋代的赵瞻

宋代进士记录在册的有1人。

赵瞻(1019-1090)，字大观，二曲镇北辛寺头村人。自幼聪颖好学，诚实忠厚。博览《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任孟州司户参赞。英宗治平元年(1064)，擢为汾州通判。神宗即位后，又迁任陕州刑狱。熙宁三年(1070)任开封府通判。哲宗元祐三年(1088)，任户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成为一位历宋四朝的名宦。他敢于直谏。卒后，太皇太后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车驾亲临，停朝二日。著有《春秋论》30卷、《史记抵牾论》5卷、《唐春秋》50卷、《奏议》10卷、《西山别录》1卷。

二、明代的进士

明代的进士有宁威、王傅、王元凯、王元正、张几、王

三聘、赵忻、李复聘、刘英、任唯一、任仕、张道学、赵岸、赵于逵、霍荣、尹禄、刘几、张万纪等 18 人。

1、宁威，字士仪，郟西（今周至县）人，嘉靖三十年任（河南）郟城知县，在任期间，发展地方经济，严惩恶霸地主，重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赞誉，但是，一些地主豪绅却不喜欢他，对他咬牙切齿，四处疏通关系，恨不得他马上就离开郟城。嘉靖三十三年，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邹宁愚欲修《河南通志》，令各州县修志以供采择，当时宁威正在筹划修志的事宜，听到上级要求修志的任务后，宁威非常高兴，他立即安排人员，亲自主修了《郟城通志》，这时传言宁威即将调离郟城，而新上任的有可能是当地一位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编纂者闻言，非常着急，几人商量后，紧急分工，收集材料，加班加点，仅月余而修成《郟城通志》，共十二卷，四册，现为海内孤本。宁威对大家的务实精神非常吃惊和感动。他对大家的业绩予以肯定，同

时指出书中的漏洞错误太多，编纂者言：“非取速也，惧易主而中辍。”宁威无奈地摇了摇头。《郟城通志》因修志时间短促，势必出错，甚至连主修者宁威的资料也出现了前后不一的记录，给后人查找宁威的确切资料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2、王傅、王元凯、王元正

三人为一父二子，一家两代三进士，世居周至祖庵南街（1958 年元月划归户县）。王元凯兄弟三人（三弟王元亨为正德二年 1507 年举人）被称为“王氏三贤”。

（1）王傅，明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二甲进士十三名，授礼部精膳司主事，后任主客郎中、左右通正太仆卿、郟阳太守、四川右参政等职。他为官直谏，所陈政见，多为朝廷所用。好读书，善属文，著有《圭峰集二十卷》、《南山漫兴诗集四卷》。

（2）王元凯，字尧卿，号终南，明正德六年辛未科中二甲进士三十七名。授兵部给事中，在朝为官四十天，因事触怒皇帝入狱。释放后归乡，专心著述。著有《天地正

气编》、《抱真赋》、《蝉噪录》、《庸玉录》等。

（3）王元正，字舜卿，号玉垒，明正德六年辛未科中三甲进士一百一十三名，授翰林院检讨侍经筵，敢于直谏。武宗皇帝南巡至河南武修时，他冒死谏阻，帝虽颇为不悦，仍采纳了他的谏言，中止了南巡。嘉靖三年（1524）爆发了“大礼议”事件，事件的经过是：大明正德十五年（1520），明武宗朱厚照在巡游中翻船落水，回京后第二年亡故，因其无子无兄弟接位，大臣们商议后决定让年仅 15 岁的朱厚璉认先帝为父即位，而朱厚璉很倔强，不但不认，反而要给生父兴献王封号，大臣无奈，只好先让朱厚璉即位（嘉靖元年），但是两派之间的剧烈争议一直不断。嘉靖三年，进士张璉上了一个奏折——《大礼疏》，认为“可以继续统不继嗣”，可以封兴献王为“皇考”，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可是有相当一部分大臣认为这是对先皇的大不敬，两派之间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王元正与杨慎等

●史料钩沉●

二百多人伏在左顺门，撼门大哭，哭声响彻殿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杖死者十六人。王元正为他们鸣冤，被贬官至茂州，戍守二十年。（《明史》卷一九二列传第八十记有载）隆庆初，赠修撰。卒后追赠光禄寺少卿。他一生著述颇丰，有《四乐同声集》、《玉垒集》、《四川总志》、《禹贡节要》、《威茂通志》等。

3、张几，字知几，辛街里人。明正德五年（1510）中举，九年（1514）中进士，任广平府（今河北省鸡泽等9县地）司理，不阿谀权贵。一位在朝廷有关系的富人的公子作恶多端，民怨极大，张几派人将那位公子拘留了起来，很多官员、乡绅前来说情，请求张几宽释，张几不依，依法公断。张几深知百姓的贫苦，他心里明白，要让百姓缴纳赋税，就得引导帮助这些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十分注重种子的选择，谁家的收成好，颗粒饱满，播种时就让大家更换或购买。后来，张几调往真定（今河北省正

定南），他整顿吏治，纠正冤案，受到百姓的欢迎，后又被召入刑部，因回避亲属关系而改任松江府丞，又调任山东佥事，按察青州（今山东益都县）诸郡。沿海地区有许多泼皮无赖，经常敲诈百姓，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张几到任后，立即捉拿当地与其有联系的豪强，那些泼皮无赖闻风逃散，隐藏在邻近府县。张几下决心除恶务尽，要将他们捕获归案，但是邻近府县认为张几越境办案是假，求功是真，共同去会见御史，大骂张几。御史竟然轻信了他们的话，不但不支持张几，反而弹劾张几，不久张几被贬。张几气愤地说：“我已成老妪，不愿再涂脂抹粉，取悦他人。”他当即奉上官印，辞官归乡。

4、王三聘（1501~1577），字梦莘，号两曲，明兴仁里（今辛家寨村一带）人。父亲王玉，因被人诬陷而含恨去世，赠南京大理评事。此时王三聘仅10岁，母亲辛氏25岁。辛氏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她奉养老人，抚育孩子，舍辛茹苦地供养王三聘读

书，孀居40年，因王三聘知名而被封为孺人。明嘉靖十年（1531）中举，十四年（1535）中进士，初任大理评事。不久，改任河南佥事。王三聘整治吏治，制定规则，人们很敬重他。母亲去世后，王三聘守丧3年，期满改任四川佥事，适逢当地少数民族起义风起，通过实地了解风土人情，王三聘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义军问题，就得对这些人恩威并举，他招抚义军中的流民，让他们发展生产，在生产中帮助他们，这样，这些人有了生活来源，不再与官家作对，社会得以安定。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却不甘心王三聘立功，他们攻击王三聘，说不杀这些人是王三聘怯懦、无能的表现。王三聘受到上级的责难，他愤然离职，回归故里。王三聘的家住房破旧，仅能遮蔽风雨，但是他却乐于公益事业。因阳化河长久未修，淤积深厚，导致洪涝来时水流不畅，经常泛滥成灾，百姓苦不堪言。王三聘急民之所急，他自费雇人测量河道，组织人力，集资物力，开始清挖淤

泥,使洪水畅达渭河,阳化河长达60年无水患。他还组织百姓搭建便桥,方便出行。周至未修县志,王三聘请示县令,自己组织编修,私人编修县志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他还乐于教育事业,看到许多娃娃无钱上学,就设立义学,把6岁至15岁的作为一个等级,诵习小学。把有文化基础者作为一个等级,讲习文艺。王三聘还购置义田,扶助亲族中贫困不能自给者。王三聘读书,讲求概义,注重心得,所写文章有大家风范。回乡30年间,著有《五经集录》、《小学集注》、《性理字训》、《三字经训解》、《字学大全》、《子史节录》、《古今事物考》、《周至县志》、《禹贡注解》、《终南仙境志》、《养生日录》。

5、赵忻,字子乐,明终南里人(今终南镇一带)。父亲赵应麟,随阮朝东研习《春秋》,多有创见,不幸的是去世很早。赵忻善承父志,年少时机智敏捷,聪明好学。明嘉靖十六年(1537)中举,二十年(1541)中进士,出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市西南)知县。

当时有一种不正之风,一些县老爷忙于抓有利的事务,把涉及百姓的事务交由县衙的师爷处理,出现了师爷欺上瞒下,贪污受贿的现象,民怨极大。赵忻到任后,痛斥了这种不正之风,凡所理事务,都要弄清事实,无所偏曲,对手下奸诈的衙役,一律除名,决不再用。长洲人很感激他的功劳,立碑记载了他的政绩。后升为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又出任保定(今保定市)太守,正遇保定饥荒,到处是饥寒交迫的饥民,一场大的起义正在酝酿之中。赵忻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开仓赈济饥民,安抚了饥民,他还组织百姓开展生产自救。后来,御史认为赵忻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才能,极力举荐赵忻,皇帝重赏赵忻,对赵忻很信任,开始任用他掌管军队,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带兵驻防。赵忻不但有文才,还是一位儒将,他整饬武备,训练士卒,部队的士气很高。这时,倭寇活动猖獗,赵忻加紧战备,紧急催饷,被官员指责,议论种种,引起朝廷的误解,被贬为广东佥事。不久,

又晋升为湖广参议。后辞官回家。

6、李复聘,字叔征,号秦麓,明辛街里(约今祖庵)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联捷进士,任(山西)闻喜知县,他看到苛捐杂税众多,百姓叫苦不迭,而官吏却不顾百姓死活,急促强征,为了缓和社
会矛盾,到任不久就实施仁政低税,逢灾年份,针对不同人家,实行缓征、减征、免征的办法,受到百姓的拥护。他任广东道御史时,不畏强权,上疏弹劾大臣11人。千户洪勋侵占百姓财产,他不顾多方说情,予以严惩,一时威名震慑,被称为“铁面御史”。调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后,上级要求剿杀“盗民”,他了解情况后
发现,“盗民”其实是劫富济贫的困苦百姓,如果贸然镇压,必将掀起大规模的农民风暴,他力排众议,通过发放适量农业补贴、鼓励无地农民开垦荒地、减轻赋税等办法安抚起事的百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他先后任江西参议,蕲州总兵等职。

(未完待续)

●史料钩沉●

如今，在大灾面前接受国际救援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不同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

谢绝美国政府援助

1959年至1962年期间，中国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1962年初，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



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新中国接受 国际救援的曲折历程

中方之所以谈到原则问题，是因为肯尼迪的粮食援助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美国利益，他想略施小恩

小惠，以诱逼中国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

唐山地震坚拒外援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

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全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就这样,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1980年中国谨慎开口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泡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

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外界舆论看来,在此时中国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原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的努力,国际社会在中国1980年旱涝灾害中,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这便是中国首次接受的国际援助。

1988年国务院出台政策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锯等物资、美国驻华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还捐赠了2.5万美元的救灾款;法国政府捐赠了治疗烧伤特效针剂6万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一个援助额为30万美元的紧急技术合作项目;联邦德国政府将向我捐助价值50万西德马克的400台油



●史料钩沉●

锯和 1500 件烧伤软膏……最终,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 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首次大规模呼吁国际援助

1991 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这一次,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

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 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做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7 月 11 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响应。1991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月 31 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 23 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争议。

·文史拾取·

古代的公费医疗

古代公费医疗在体制上的支撑点,即所谓“医在王官”,就是医药行政、医疗组织和医学教育的主导权都归政府掌握。据《周礼·天官》记载,这个制度在西周就已经确立。秦汉以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到了唐宋年间,已经相当成熟。唐宋规定,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其负责。除了京官,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

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患病,就请他们治疗。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北宋时,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遗缺即补。国家除包干官吏的医疗之外,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还可经常获得以皇帝名义赐给的各种时令保健防疫药物。

元代皇帝为何无陵墓

每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这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崩，“用椁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行，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南宋文人的笔记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万马踏平”后，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

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

忽必烈在位期间，他对元朝皇帝陵墓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选择一个人口稀少的风水宝地作为陵寝的埋葬地，然后将当地的所有人口进行迁移，让这个地方变得无人知晓。下葬时，不允许汉族官员参加送葬仪式和到达下葬地点；皇帝去世后，对外宣称皇帝遗体运回漠北进行安葬，并且在历史的记录中加以记载，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让盗墓贼无法下手；陵墓不做过多的建筑，不设置过多的随葬品，不设置墓碑，使得皇陵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墓葬没有区别。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的编造，加上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性还有很多不为外界所了解，这就使后代很难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原由。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西安古城墙之清西安城军事布防

一、八旗兵统兵官署

清朝军队的编制分为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编制不同,统兵关系亦各异。八旗兵是其传统武装,始建于后金初创时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其女真族氏族制度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军政合一、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壮丁,无事耕猎,战时出战。

八旗制度的编制是以三百丁为一牛录,由牛录厄真(汉译称佐领)统领;五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厄真(汉译称参领)统领;五甲喇为一固山,由固山厄真(汉译称都统)统辖,共有八固山,约6万人。八固山分别以黄、红、蓝、白和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色作为标志,故称八旗兵。除满洲八旗外,后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

军八旗,兵额共约二十二万。八旗兵种分为亲军、骁骑、前锋、护军、步军,此外,还有特种兵神机营、健锐营、枪营、炮营、火器营、藤牌营等。八旗兵是清军的主要军事力量,而其中的满洲八旗,又是最基本的骨干。

八旗兵的部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八旗兵其中以满蒙官兵为主,驻屯于京师,称为“禁旅小旗”,或称“禁卫兵”、“京营兵”,用以保卫皇帝安全和拱卫京师,兵力约十一万人

左右。另一部分八旗兵,分驻于全国各省省城、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称为“驻防八旗”,或称“驻防兵”,负有震慑地方、监视绿营和保卫边防的重任,兵力亦约十一万人左右。驻防八旗在各地一般以满蒙汉兵合组为营,分为左右翼,翼各领四旗。左翼领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领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驻防八旗驻在满城内。若不敷居住,如在西安又傍满城另筑南城安置。驻防八旗上隶中央八旗都统,防务归于兵部,在地方上受将军、都统、副都统率领。

西安将军署 清西安驻防八旗军最高武官衙署。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清廷多次派八旗官兵驻防西安,并初设西安驻防八旗长官昂拜章京一人。康熙元年(1662年),更名西安将军,或称镇守西安将军,从一品,镇守地方,统辖旗军。其属设满洲与汉军左右翼副都统各一员,从二品;八旗满洲协领八员,正三品(每旗一员);佐领四十员(每旗五员),防御四十员,骁骑校四十员,八旗蒙古协领八员,八旗汉军协领八员等。西安将军署在满城西北隅吉茂巷,旧址约在今北大街西五路西段路北交大二院处。

左翼满洲副都统署 清西安左翼满洲驻防八旗军武官衙署。清西安驻防八旗军中的满蒙汉军,均分左右翼,各领四旗,各置武官副都统一员,从二品。左翼满洲副都统署在满城东北隅,旧址约在今西安城东北隅解放路西五路东口路南。

右翼满洲副都统署 清西安右翼满洲驻防八旗军武官衙署。顺治十八年(1661年)置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二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定左右翼各一人,正二品。署址在满城西华门大街,旧址在今西安西新街。

左翼汉军副都统署 清西安左翼汉军驻防八旗军武官衙署。[嘉庆]《咸宁县志·衙署志》：“旧有汉军副都统署二，一在镶红旗，缺裁后改为匠役局；一在南城内旧郃阳王府，缺裁后归县管辖。”满城镶红旗旧在今西安城解放路东新街中段处，南城旧明郃阳王府在今西安城东南隅和平路与建国路之间。

右翼汉军副都统署 清西安右翼汉军驻防八旗军武官衙署。清初置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一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省,二十八年(1763年)复设,正二品,隶西安驻防将军,统领西安右翼汉军八旗兵。署址在满城原秦王府南门外天地坛故址处,旧址约在今西安南新街北段路西。

二、绿营兵统兵官署

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新募汉兵编制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因其以绿色旗帜为标志,以营(500人为一营)为基本建制单位,故名绿营兵,总兵力约有六十万人。绿营兵除少数驻守京师地区称巡捕五营(又称京营)外,主要分驻于全国各地,在地方上接受总督、巡抚及提督、总兵等武官统辖。

清代驻防各省的绿营,其兵因官分类,总兵以上所辖皆称标。其中总督所辖称督标,巡抚所辖称抚标,提督所辖称提标,总兵所辖称镇标。标兵为机动兵力,集中屯驻,装备较好,武器以刀、箭为主,其次是枪、炮等火器。标下有协、营、汛。副将所属称协,本镇冲要,率兵协守;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城邑关隘,领兵专守;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每

汛有数人至数十人不等),道路边境,分汛备御。

清陕西总督部院署 清代陕西总督衙署。清沿明制,正式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并为各个军区绿营兵的最高军事长官,辖一省或数省,官阶从一品。因其分别加兵部尚书或左右侍郎,并例兼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衔,故称部院大臣,衙署称总督部院署。总督虽多系文官,但职权很大。《清史稿·职官志》总督:“掌厘治军民,综治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顺治元年(1644年)置陕西总督,兼辖四川。康熙三年(1664年)更名山陕总督,辖陕西、山西。雍正时期称川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四川。总督署先后徙驻固原(今宁夏固原)、汉中、兰州、肃州(今甘肃酒泉)、四川、西安等地。清西安总督部院署先在今南院门中共西安市委大院处,光绪十四年(1888年),巡抚叶伯英移驻督署,“南院”遂成为巡抚署,而总督行署迁驻“北院”,即今北院门西安市政府大院处。

巡抚署 清陕西巡抚衙署。清沿明制,正式定制各省设巡抚一人,从二品,为省级地方军政长官,统布、按两司,总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等。《清史稿·职官志》:“巡抚陕西等处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西安。”巡抚俗称“中丞”,与总督同为封疆大臣,惟品位略低。雍正元年(1723年),巡抚多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故巡抚署亦称巡抚部院署。原为满缺,雍正九年(1731年)开始参用汉人。清陕西巡抚署沿用明巡抚署址,在今西安城西大街鼓楼北面的“北院”,即今西安市人民政府大院处。光绪十四年

●西安风情●

(1888年),巡抚叶伯英移署于南院门街的“南院”,称巡抚部院新署,而将总督行署改移“北院”。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十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以南北两院为行宫,驻蹕于“北院”前巡抚署后为总督行署处。

督标中军副将署 清陕西总督所辖绿营兵武官衙署。清制各省总督所辖绿营兵称督标。陕西总督辖今陕甘地区,领本标中、左、右、前、后五营。其属副将一员,从二品;参将二员,正三品;游击二员,从三品;都司一员,从四品;守备五员,正五品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陕甘总督所辖绿营兵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八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展为九万七千二百六十七人。由副将统理督标军营事务,称督标中军副将。陕西督标中军副将署驻西安水池三坊,旧址约在今西安西大街中段路南红光街与四府街北段之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并兼甘肃巡抚后,原甘肃抚标改为督标,旧设西安督标改为提标,并令固原提督回驻西安。

抚标中军参将署 清陕西巡抚所辖绿营兵武官衙署。陕西巡抚辖抚标中、左、右三营。其属参将一员,正三品;游击二员,从三品;守备三员,正五品;千总五员,从六品等。其中参将领中军兼左营,共领马、步、战守兵一千一百二十七名,内马兵二百九十一名,步兵三百九十三名,战守兵四百四十三名。署在府城西安巡抚部院之东,旧址约在今西华门街市人民政府东侧。

另有抚标中营守备署在今西安城西北隅青年路中段,抚标左营游击署在今西安大皮

院中段,抚标左营守备署在今西安红埠街,抚标右营游击署在今西安西南隅四府街南段,抚标右营守备署在今西安西南隅东椰子市街处。

陕西提督署 清陕西绿营兵提标武官提督官署。顺治三年(1646年)设陕西西安提督一员,从一品,节制四镇,统辖本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兼辖西安、靖远、潼关、商州城守四协。署驻西安城西南水池三坊原督标中军副将署,旧址在今西安西大街中段路南红光街与四府街北段之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移驻固原、汉中。

西安镇署 清西安镇标绿营兵总兵官署。清制以总兵为绿营兵高级统将。凡总兵所管辖的营兵称镇标,其地位略等于道员,受本省提督和巡抚节制。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西安镇,置总兵官一员,正二品,领镇标绿营兵中、左、右三营,并辖潼关协、宜君营、商州城守营、金锁关营、周至营,统领绿营兵约六七千人。署址驻西安城水池三坊,以原提督署改建。

西安城守协副将署 清代镇守西安的提标绿营兵协级武官署。清制绿营兵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单位,协由副将从二品武官统领。清末编制变为三营为一标,两标为一协,协相当后来的旅。西安城守协副将,始设于顺治二年(1645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改设参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复设为副将。西安城守协副将职在维护西安城防安全,清末时兼辖周至地区绿营,受提督节制。《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职官》:“西安城守协副将一人,辖本标左右二营,兼辖整屋一营,驻西安府。”

署址在今西安五味什字。

另外，西安城内的统兵衙署还有属西安提督所辖提标绿营兵的西安城守营参将署，在府城西北隅，旧址约在今尚武门内西北三路北段西侧；属副将所辖协标绿营兵的协标都司署，在今西安北大街中段二府街中段路北；协标右营守备署在西安“油巷口西边”，旧址在今西安城西南隅梆子市街西段等。

三、兵力部署

清代时期，八旗兵八千马甲驻防西安满城与南城，满城与南城成为纯军事性质的大军营。清制规定，满城内八旗兵驻防汛地有固定的位置，“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满洲实录》卷三）。

首先，西安满城内八旗兵是按左右翼东西分区驻防。“八旗校场”与今尚德路以东，为左翼汛地（驻防与巡逻地区），由北而南，分驻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四旗；尚德路与八旗校场以西为右翼汛地，由北而南分驻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四旗。

其次，满城内各旗布防的位置，也有定制。按照《大清会典》规定：“城之北曰镶黄、正黄旗，其东曰正白、镶白旗，其西曰正红、镶红旗，其南曰正蓝、镶蓝旗”（《大清会典》卷八十四）。按照八旗驻防的规定，西安满城内八旗的兵力部署，大体以八旗教场为中心，镶黄、正黄旗驻防在八旗校场的北方，即今省政府以北的东西两部地区；正白、镶白旗驻防在八旗校场以东，即今解放路到东城墙地区；正红、镶红旗驻防在八旗校场以西，即今省政府至北大街之间地区；正蓝、镶蓝旗驻防在八旗校场之南，即今西一路至南大街，东自大差市西

至钟楼之间。

再次，满城内各重要地段，分设有 35 个堆房（驻兵巡防哨所），其中镶黄堆房 5 处，正白堆房 7 处，镶白堆房 2 处，正蓝堆房 3 处，正黄堆房 6 处，正红堆房 2 处，镶红堆房 5 处，镶蓝堆房 3 处，步军堆房 2 处。八旗堆房的分布，大多设在本旗汛地辖区，但也有分设于其他旗辖地。如镶黄旗的 5 处堆房，有 2 处设在本旗汛地城北，另在 3 处堆房却设在满部南部；又如正白旗的 7 处堆房，5 处设在本旗东部汛地，1 处设在八旗校场东侧，另 1 处却设于满城西北隅。

满城共有 7 条街 94 道巷，其中分驻八旗驻防的各级衙门、兵营与随营军眷等。汉军南城主要驻防左翼汉军八旗兵，西安城东南隅的防务，则主要由其负责。

清代时期，驻守陕西的绿营兵额定为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人（《清史稿·兵志》）。事实上，乾隆时期还有所增加。驻陕的绿营兵除分屯一些州县与关隘冲要之外，多驻屯于省会西安城中。

清代西安城内，除满城南城所在的城东北与东南地区由八旗兵驻守外，其余地区归绿营兵防守。其布防地区，可以从府城内绿营各标的练兵校场划定其大致的区域。如巡抚所辖的抚标绿营兵，主要布防在府城西北隅教场门至尚武门西的“抚标教场”（西武园）一带。由西安提督所辖提标绿营兵，主要布防在今西安西大街中段路南一带。总兵所辖的镇标绿营兵，主要布防在“镇标教场”所在的今小南门附近一带。右营守备统领的协标绿营兵主要布防在府城西南隅。



唐长安花市

古长安城的真正建立，是自西汉建立始，其间历经后世诸多皇帝的扩建，使“大汉帝国”的都城壮观瑰丽，举世无双。至隋重建大兴城，唐又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兴建了宏大的唐长安城，奠定了今日西安古都城的地位，唐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高度开发的文明，使得长安呈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便是昔日大唐都城长安繁华兴旺、通达广宇的写照。而长安花市则随着长

安城的变化沉沉浮浮，其变迁反映了长安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进步。

自唐代始，花市就融入了长安人民的生活。据史书记载，唐时长安城里有专门集中售花和供人赏花的市肆。韦庄有诗曰：“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说的就是长安城里的花市繁花似锦，生意兴隆，一派热闹景象。宋朝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又云：“去年元夜时，花市

灯如昼。”当时花市的繁华，可窥一斑。

说到长安的花不能不说唐诗人孟郊，他从小家境贫寒，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作为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文人，他自然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但当他远赴长安应进士试时，却一再地遭受失败，直到他46岁才算顺利考中。

唐代进士考试规定在秋季举行，隔年春天发榜昭告天下，按照惯例，发榜之日正是长安城中百花盛开之际，新考中的进士们例有游园赏花之举。孟郊的一首《登第》抒发了诗人及第后的得意之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中可以想象出他当日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是何等的热情奔放，神采飞扬。“长安阅花”遂成封建时代无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情。有人说诗中的花是牡丹，

也有人说是其他的某种花。其实是泛指很多种的花,没有特指,只是为表达一种畅快愉悦的心情。千百年来,这两句诗已经演变成为意气风发、乐观向上的同义语,激励人们积极进取。

唐时最为繁华热闹的大概要数长安的牡丹花市了。由于从事花木栽培和销售获利丰厚,长安城中百姓很多操持此业。他们每至春暖花开之季,在街面上辟出空地一方,周围加上防护用的篱笆栏,遮上幕布,将含苞待放的花卉移植地上或种植于盆中,精心护持修剪后叫市待买,形成当时特有的街市景观。其后经“安史之乱”,唐国力日渐空虚,虽唐宪宗“元和中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大唐帝国仍然不可挽救地衰败下去。白居易在其《秦中吟》最后一首诗《买花》中通过对花市的描写反映了

当时社会的状况及其矛盾:“京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花朵,戈戈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意思是花市繁荣,熙熙攘攘,但是宦宦之家买一丛牡丹花,其价值竟然等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仅仅一丛的享受,却是十户百姓的血汗,这数量上的简单对比,显得尤为分明、强烈,

深刻地揭露了宦宦权贵奢侈腐化的生活,可见当时社会剥削之重和人们生活之困苦。其后历经战乱和时代变迁,长安花市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和发展下来。

进入21世纪,古都长安的街市更不缺乏花的点缀,花市的规模和数量也不断扩大。现在不仅花卉品种繁多,各种造型也层出不穷,买花又方便又便宜。昔日“灼灼百花朵,戈戈五束素”的美丽花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人民居家摆设欣赏、陶冶身心好伙伴了。





中华老字号“德发长”

富小云 整理

德发长创建于1935年，经营饺子已70多年，是历史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主要经营北京风味的饺子，其特点是制作精细、皮薄馅足、料重味浓、油润鲜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博采众家所长，创造了独特的饺子宴。集中国历代饺子制作之大成，溶中华菜肴调料技艺于馅心，取南北制作工艺之精华，选用鸡、鸭、鱼、虾及鱼翅、鲍鱼和时鲜果蔬、野菜等多种原料，采用蒸、煮、煎、炸、烙等烹制方法，烹饪出了肉香型、卵香型、果香型、酱香型、素香型和海鲜香型等六大香型的多种口味，品种达300多种，

饺子咸、甜、酸、辣、麻五味俱全，花、鸟、果、禽、兽形态各异。真乃是：一餐饺子宴，尝遍天下鲜。饺子造型上也综合了捏塑、雕塑、组合、点缀等技艺，使每一款饺子造型技术都与现代艺术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有象征吉祥的四喜临门、一帆风顺、满载而归、恭喜发财、吉祥罗汉；有形态逼真的金鱼戏水、彩蝶迎春、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百花争艳、雪中送炭、白银墨玉。把选料与多味、烹饪与营养、形态与艺术、饮食与文化等巧妙融会在了一起，具有“一饺一形一态，百饺百馅百味”的显著特

点。好一席艺术荟萃，好一部饮食经典。饺子宴问世以来，广受国内外美食家的青睐，成了到西安必食的地方风味特色，被誉为“神州味苑的一颗奇葩”，并荣获国家“金鼎奖”。

如今，德发长已成为当今中国供应品种最多，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特色饺子宴和风味水饺、新派海菜的专营店。2007年5月，中华老字号德发长饺子制作技艺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它也是西安市第一批3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孔子 在川上叹什么



自古以来,人们对《论语·子罕》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着多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在战国到西汉时期,人们依循“君子比德”的思维模式,视“逝者”为一往无前、勇猛精进的态度与精神。这与孔子的勇者精神相契合,是该句的文本义和作者义。第二种理解是在东汉末至六朝时期,“慷慨有馀哀”的时代情绪投射到经典解读上,郑玄以后的经师都以“逝者”为时间,川上之叹是伤

逝情怀的流露。这是读者义。第三种理解是北宋到清代,道学家们从中读出了力行精神,并由此直追道体。这里有文本义与作者义,同时也内含着道学家的读者义。近代以后,由于经典的浓度被稀释,汉末魏晋时期“逝者”即“时间”的解读又被重新拾起。“时间过得真快啊”之所以成为“逝者如斯夫”的现代通释,除了教科书、工具书的普及作用外,还因为这个义项最大众化。

·知识窗·

古代的“秘书”

秘书是古代掌管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在甲骨文里称“贞人”,是指首领身边参谋议事、制作公文的人,与今天的文书人员有些相似。

西周设的秘书官,也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主要是记录大事,掌管著作简册。汉代以来有秘书监、秘书郎,三国时魏有秘书令、秘书丞,可见“秘书”之名早于“书记”。秘书并非官名,必须在秘书下

缀上“令、监、丞、郎”等才是完整的官名。

南朝时梁始设“秘书省”,属行政机构。虽然有“秘书”之名,但与秘书无关。明清时不设此机构,也没有“秘书”的职称。明代陈继儒虽有《许秘书园记》一文为常州许自昌作,但许自昌仅是一位喜欢藏书、刻书的士绅,称之为“秘书”想是对他的赞称。清代各署衙设文案,一般称“师爷”。民国时,大多数的行政机关都设秘书。



嵇康嵇绍两父子

魏晋七贤中的嵇康，出身高贵，是曹操的侄孙女婿，嵇康没有去过锦衣玉食的官宦生活，而是采取了一种“反叛”的姿态，与其他名士一起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公元 262 年，嵇康被押上刑场，临刑前，他叫人拿来一把琴，从容地弹起一曲《广陵散》。

老子英雄儿好汉。像嵇康这样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按常理，他应该教育后代继承自己的“遗志”，可是，嵇康在临刑的前刻，做了一章《家诫》给十岁小儿嵇绍，教育他千万不要学他的样，其诲语敦敦，洋洋千言。他教嵇绍：公款酒宴，碰到有人争论，不要在旁边看，要离开；别人劝你喝酒，你即使不愿意喝，也不

能拒绝，而是要谦卑客气地端起杯子，一口干。

嵇绍果然听了老爸的话，没了半点“造反”心态，全是一种“忠奴”禀性了。他后来服侍晋惠帝，就是那个听到青蛙叫就问大家“是为公鸣还是为私鸣”的史上最傻的皇帝。

河间王与成都王起兵叛变，京城告急，晋惠帝与成都王交战于荡阴一带。不料晋兵兵败如山倒，随驾官员们各自保命，唯有嵇绍，独自护在皇上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雨一般的流箭，嵇绍倒在了血泊中，惠帝得救了。

嵇康被主子杀死、嵇绍替主子去死，这两父子都是因帝而死，一个是英雄之死，一个是忠奴之死。

嵇康没想到吧，在命运不能自主的时代，不但为自己设计的自由与独立之路走不通，为儿子设计的平安而庸常之路也是走不通的。

纠错：《西安地

方志》2009 年第 6 期 P17 《马德涵先生与周总理的友谊》一文中，对马德涵先生的照片使用有误，特此致歉。



马德涵

典故里的虎

十二生肖中的动物,除虎蛇之外,都不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命。很难解释虎蛇进入十二生肖的理由。深山丛林中的虎,何等不可一世,骄横跋扈,很少有什么动物能让它屈服。

《后汉书》记载,汉朝有两个叫宋均、刘昆的地方官,为政有方,因尽除境内的恶虎而政绩卓著。这个史实后来以虎渡江的名义镌刻史册。恶虎渡江而去,百姓安居乐业。

虎项金铃,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典故。若干年前,在金陵城西清凉山上的一个寺院中,秋日的阳光,躲过了黄叶的遮挡,弥漫在香火的气息里。方丈法眼禅师,道行高深,慧眼识人。法灯和尚,性情豪爽洒脱,不肯好好念经。和尚们瞧不起他。但法眼禅师却对他另眼相看。一天,法眼禅师在宣讲佛法以后,问僧徒们:“如果老虎的颈项上系着一只金铃,你们说谁能解得开?”众弟子瞠目结舌,抓耳挠腮。这时,法灯正好从外面回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很容易。这个金铃是谁系上去的,谁就一定解得下来。”

《战国策》里讲述着三人成虎的故事:魏国大夫庞恭和魏国太子一起作为赵国的人质,定于某日启程赴赵都邯郸。临行时,庞恭向魏王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对您说,我看见闹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只老虎,君王相信吗?”魏王说:“我当然不信。”庞恭再问:“如果是两个人对您这样说呢?”魏王说:

“那我也不信。”庞恭又追问道:“如果有三个人都说亲眼看见了闹市中的老虎,君王是否还不相信?”魏王说道:“既然这么多人都说看见了老虎,肯定确有其事,我不能不信。”

佛的典故里有舍身饲虎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南瞻部洲有一个大国,叫摩诃罗檀囊,统率着五千多个小国家。国王的三个王子里,小王子摩诃萨青天生具有一副慈悲心肠。一天,国王和王妃带着王子出外游玩。国王游玩了一会觉得有些疲劳,就找了个地方休息。而三位王子如同出笼的小鸟,快活地穿梭在丛林之间。忽然,他们发现一只雌虎正给两只虎仔喂奶,正值寒冬,雌虎面黄肌瘦。为了充饥,似乎正要吞食虎仔。小王子见此情景,顿发慈悲。他让两位哥哥先走一步,自己走到雌虎面



●文史拾趣●

前,毫不犹豫地身体投向虎口。不料,饿虎只朝他望了一眼,却闭着嘴巴不肯吃他。小王子找来一截尖锐的木头,往自己身上猛戳,鲜血汨汨而出。雌虎看到鲜血,立刻吐出鲜红的舌头,舔食王子的鲜血,吞吃王子的肉体。两位哥哥迟迟不见弟弟跟来,急忙跑回雌虎停留的地方一看,弟弟已经被饿虎吃得精光,只剩下带血的白骨散落一旁。雌虎吃完小王子的肉身,一不小心竟从悬崖上跌下,晕了过去。待它醒来,就跑回小王子的白骨旁徘徊忏悔。舍身饲虎的摩诃萨青王子,死后投生到优美的天界。他对眼前的善果感到迷惑,于是运用天眼,察遍地狱、饿鬼、畜生、修罗和人间五个世界,对父王以及世间的人类发出劝告:为非作歹的人,都会下地狱,凡有善行的人,都会出生天界。你为什么还沉陷于忧愁与烦恼之中,而不能觉悟呢?

以身饲虎,在凡人看来并非善事。可是,佛家自有它的道理。它借用了这个典故,表白了一个因果关系,让人积德行善,从而抵达仙界。

人类是绝不可能与虎和睦相融的。但在中国文化的底层,虎却成为人类抵御灾害和邪恶的吉祥物。不少乡村人家墙上显赫的位置,悬挂着虎图。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滑稽,承载着乡民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可是,从来就没有人对这种现象说三道四、品头论足。逐渐文明的岁月里,凶猛残暴的虎,已经被人类用笼子养了起来,不再令人望而生畏。凶猛的虎,已经蜕变为人类的精神玩偶。

·知识窗·

『八字还没一撇』的真实来历

人们在说事情还没有眉目时常常会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对此人们一般理解为“八”字先撇后捺仅两笔,连第一撇都还没有写,八字远着呢。追根溯源,这句俗语是来自一个历史典故。

南宋理学家朱熹《与刘子澄书》一文云:“圣贤已是八字打开了,人自不领会,却向外狂走耳。”就是说,通向圣贤的大门早已敞开,可是人们并不领会,不但不进去,反而朝外走。

因“八”字形似两扇门,朱熹在这里以“八”字喻门,很是形象,俗语“八字没有一撇”即源于此。所谓“八字没有一撇”本意是指没门,和我们常说的“没门儿”一样,后来便演变用来指事情还没眉目,早着呢。



朱元璋的忆苦饭

朱元璋打天下, 历经辛苦。坐了江山后, 他就规定, 每顿饭必有粗菜, 让后来的皇帝们“知外间辛苦”。这成为明朝自始至终的一个家法。据说这是明朝宫膳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朱元璋每顿饭都上一个豆腐, 但是, 到了他的子孙们的手上, 这每顿必有的豆腐, 就变味了。清代吴骞《拜经楼诗话》讲述了一个明代宫廷豆腐的故事: 京城各官署中, 翰林院是清水衙门, 皇帝如到别的地方赴宴, 翰林们就可怜巴巴地向光禄寺索要剩下的御膳, 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 皇帝去赴宴, 众翰林纷纷去讨皇帝的剩饭。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 只端回一盘豆腐, 大为懊恼, 放在桌子上生闷气。一个后来的老翰林知道了, 十分高兴, 连喊“拿酒来”, 然后大快朵颐而去。原来, 朱元璋的后代们虽然保持了顿顿上豆腐的家法, 其实那些豆腐的原料, 已经不是豆子, 而是鸟儿的脑髓。一份豆腐需要数百只近千只鸟脑袋。

朱元璋的忆苦饭并非仅仅是豆腐, 还有一些苦菜之类的东西, 也是要求每顿饭都要陈列在御膳中的。保存下来的崇祯皇帝的食谱中就有苦菜根、苦菜叶、蒲公英、芦根、蒲苗、蒜薹、苦瓜之类的粗菜。皇帝的粗菜也是极有品味的。比如崇祯皇帝是这样吃青菜的: 先将青菜放在生鹅肚子里, 放上水闷煮, 然后

拿出来用酒洗干净, 再用麻油等作料调制。吃这种粗菜, 也许皇帝还会认为, 这种野菜味道不错啊, 谁说老百姓吃糠咽菜不容易?

“豆腐”、“粗菜”还只是表面, 宫廷御膳的巨大花费更是惊人。

明代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组织, 就有光禄寺、尚膳局和尚食局。只光禄寺一个机构的皇帝御膳食材采购人员和厨师的编制人数, 宣德朝是 9462 人。

宫廷所有的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是皇帝夫妇、父子, 但是, 在宫里服务皇帝等人的太监、宫女等也都有一张嘴, 都要吃饭。康熙皇帝总结明朝的教训时曾经说, 明朝宫廷有宫女 9000 人, 太监 10 万人, 没有办法给每个人提供饭食, 有些人往往饿死了。10 多万人吃饭, 有成千上万的庞大采购团、厨师团伺候, 也是不难理解的。

这么多的人吃饭, 伙食费肯定也是一个大数字。根据历史的一些记载, 明朝崇祯皇帝的伙食费是每天 36 两银子, 皇后是每天 11 两半银子, 这些都不包含原料费。这样, 皇帝一个月伙食费是一千多两银子。一般来说, 那时候一两银子大致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一般是 120 斤左右。就是说, 崇祯皇帝一个月的伙食费, 可以买 12 万斤左右的大米, 可以让 4000 人吃一个月。



贺卡今昔

在很多人心中，贺卡是一种舶来文化，寄送新年贺卡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贺卡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北宋时期出现了冬至寄门状的习俗，至清初发展成为元旦寄送用红纸制作的表示吉庆的贺帖——红单。可见，用贺卡传递祝福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最早的贺卡出现在1843年的英国，当时贺卡上只有一句话，但直至今日仍是西方贺卡上最常见的，这就是“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you”(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自19世纪70年代从美国开始。圣诞贺卡在西方国家得到普及，早期的贺卡图案多以家庭聚会、跳舞和冬

天的画面为主，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文化。

中国的贺卡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喜庆的中国红让人一看就心生喜气，还有喜鹊、红梅、福寿、鞭炮、对联，每一样都不得不说“很中国”。

现在的中国贺卡，不仅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也融合了更多现代中国的符号，就像深受大家喜爱的卡通明星“喜羊羊”也已成为中

国贺卡上的明星。

近十年来，在华外资企业定制的新年贺卡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他们把这些具有明显中国符号的贺卡不仅寄给身在中国的客户和朋友，也寄往世界各地，一方面向中国朋友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尊重，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传递中国文化，突出他们身在中国的特殊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也反映出这些外企在逐步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

寄送新年贺卡现在仍是很多人一到初冬即着手准备的一件重要事情。大家都喜欢把最具中国味的贺卡寄给身在远方的朋友和亲人，让世界各国的朋友收到“最中国”的祝福，让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能手握亲人的祝福，感受到祖国的力量。





我国历史上的文人，似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流传着许多轶闻趣事。

文人与酒关系密切名声最大的，大概要数唐代的大诗人李白。郭沫若说：“李白真可以说

是生于酒而死于酒。”据统计，现存的李白的诗文作品，至少有六分之一谈到饮酒。隐居时饮酒，求仕时饮酒；得意时饮酒，失意时饮酒；宾朋相聚时饮酒，独自一人饮酒；有钱时饮酒，无钱时典当什物还要饮酒。暮年甚至将悬在腰间多年的心爱的宝剑摘下来换酒喝。在给妻子的《赠内》诗写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作客他乡时《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有“南风吹归心，飞坠酒楼前”，仍忘不了酒。人们称他“醉圣”，他自称“酒中仙”。

李白的死，据郭沫若考证，系患急性脓肿

症，酒精中毒是病源之一。由于嗜酒，至死不休，更使这样的病没有治愈的可能。但后人却传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仍与酒有关。后人写李白的志、传、诗文等作品中，也都说到他与酒的关系。可以说李白嗜酒，确成了妇孺皆知的事了。

杜甫是李白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他的嗜酒并不在李白之下。杜甫从十四五岁起，就是一位“酒豪”，以后也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径须相就饮一斗”。

大历五年(770年)，杜甫避难到耒阳，被大水所阻。后来县令在大水中找到了他，并送去酒和

史上那些嗜酒的文人

牛肉，以示慰问。可能酒和肉都比较多，一时吃不完，肉变坏了。杜甫吃了变质的肉，加上喝酒，促使毒素在血液中循环，以致中毒而死。虽说关于杜甫之死，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说他是吃得过多“饱”死的，也有说是淹死的等，但都不否认杜甫嗜酒的事实。

唐代嗜酒的文人很多。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除了李白外，还写了七个人：书法家张旭，相传他往往大醉以后，呼叫狂走，而后落笔，或者以头发濡墨而书，酒醒以后自己看了也觉得写“神”了，他的草书叫“狂草”。文宗时，人们以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

草书为“三绝”；贺知章，曾任太子宾客，很赏识李白，呼为“谪仙人”。有一次，与李白饮酒，贺知章竟解下身上配的饰物金龟换酒，使李白念念不忘；曾任左丞相的李适之，很喜好宾客，常常与人夜里饮酒，白天仍照常办事，他的酒量很大，杜甫形容说“饮如长鲸吸百川”；焦遂，据说有口吃，说话不清楚，可是喝醉酒后，高谈阔论，声音响亮；还有美貌、潇洒，“举觞白眼望青天”的崔宗之；“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李璡；“醉中往往爱逃禅”的苏晋。

当然，唐代文人中嗜酒的远不止以上说的几个。如王维、杜牧、李商隐、白居易等等，都无不嗜酒。白居易还作了一篇《酒功赞》，其中说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唐代以前的文人与酒，流传的轶事也举不胜举。

三国时吴国太中大夫郑泉，史书上说他“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他常对人说，希望能在大船中装满酒，在船的两头摆上时鲜佳肴，边饮边吃，酒稍有减少，立即加满。到临死时，对同辈们说，我死以后，请把我埋在陶器作坊旁，百年之后，我的尸体化为泥土，有幸人们用它做成酒壶盛酒，就满足我的心愿了。

魏晋时期的文人，无论“建安七子”还是“竹林七贤”，无不嗜酒。“竹林七贤”中的刘伶，纵酒放达，有时赤身裸体在家中饮酒。客人来了讥笑他这种举动，他说：我以天地为房屋，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他常乘着鹿车带着酒，命人拿着锹和他一

起出门，走一路，喝一路，说：我如果死了，就地埋掉就是了。他的妻子见他如此嗜酒，哭着劝他断掉。刘伶说，我自己断不了酒，只能向鬼神发誓才能断掉，请赶快准备敬鬼神的酒肉吧！他的妻子很高兴，立即在神前供上了酒肉，要刘伶来祝誓。刘伶跪倒在神前祝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坚不可听。”祝罢，大吃大喝起来，直到醉倒。

阮籍，是“竹林七贤”中另一著名的嗜酒的文人。“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他家邻居有一个小酒店，店主的妻子容貌很美。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倒在女店主旁酣睡，也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他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就请求去做步兵校尉。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借助于阮籍，阮籍虽不愿意，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只好大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无开口的时机而作罢。阮籍的母亲死时，别人来通知他，正逢他在下棋。对弈的人劝他不要下了，他却硬要争个结局。棋下完后，饮酒三斗，大号一声，吐血数升。按当时的礼俗，居丧是不能饮酒的，而阮籍却照样饮酒如故，甚至在赴司马昭的宴会时，也饮酒食肉，毫无顾忌。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都因阮籍喝醉了酒而无法罗织罪名。阮籍的亲戚、族人阮修、阮咸等，也莫不嗜饮。据《世说新语》记载，阮咸与族人聚饮，不用普通的杯斟酌，而用大瓮盛酒，围坐痛饮，遇有一群猪挤了过来拱着鼻子，也毫不在意。

被誉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很喜欢饮酒。被后人推崇为“行书之宗”、

“法帖第一”的《兰亭序》就是在他与友人饮酒聚会，“一觴一咏”时的作品。古时人们迷信，三月上巳日，到水滨去洗濯欢聚，可以消除不祥，叫“修禊”。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谢万、孙绰等名流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围坐在一段弯曲的流水旁，用漆制的酒杯盛酒，再将杯放在上流水面上，任杯随水漂浮，止于何处，就由坐在何处的人取杯饮酒，叫“流觴曲水”。据说当时名流们喝得极高兴，一共做了三十多首诗。王羲之乘兴用鼠须笔在乌丝阑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了篇序文，就是《兰亭序》。

魏晋文人之所以嗜酒的特别多，一方面由于当时士大夫贵族中流行服用“五石散”之类的药物，相信它可以使人健壮延年。而服这种药后，身体发冷，必须喝热酒。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正如南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书》中说的，“盖方时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以为保身之计”。

唐代以后的宋代，朝廷推行酒类的专卖政策，取得大量财政收入，因此，饮酒之风极盛。文人中，包括道学先生朱熹、程颢，也都饮酒。文学家苏舜钦、石曼卿，堪称疯狂的酒徒，饮起酒来花样翻新。有夜里不燃烛的“鬼饮”；不戴帽子不着鞋、

铐手镣脚的“囚饮”；坐在树上的“巢饮”；以草缠身，伸头喝酒，喝完将头又缩回草束中的“鳖饮”。有一次，石曼卿与友人饮酒，喝到夜半，酒将罄，一时无有来源，只找到一斗醋，于是兑到酒中继续喝起来。直到次日，酒醋都喝尽了才作罢。

宋代的文人，除上述的以外，范仲淹、柳永、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周邦彦、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都莫不饮酒。

明代文人邱濬，是坚决主张禁酒的。他认为酒能伤身、致疾、乱性、败事。晚于邱濬一百年的袁宏道，不仅嗜酒，还有专谈酒事的著作《觴政》，至今也很有参考价值。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也是一位坚决的禁酒主义者。在他看来，“水为地险，酒为人险”。可是他也喝酒，不过很有节制，据说“三醕既毕，即起还寓”，更反对“夜饮”，认为不是正人君子应有的行为。





毛泽东曾用过的 二十六个名字

毛泽东的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谱牒而取的。《毛氏族谱》定下的子孙名字族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比如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就是“恩”字辈，父亲毛贻昌，即是“贻”字辈，毛泽东和兄弟毛泽民、毛泽覃等都是“泽”字辈，毛泽东的下一代即“远”字辈，比如毛远新。

毛泽东一生中，除正名“毛泽东”外，还曾先后用过 26 个名字(包括化名)。

第一个名字是石三伢子，即毛泽东的小名。1898 年，毛泽东 5 岁时，为了祈求长命富贵，素信佛教的母亲文氏领着他来到韶山观音石前焚香跪拜，认了“石干娘”。因毛泽东在家排行第三，故此父母家人以及乡人，都叫他石三，或石三伢子。

第二个名字“毛润之”。这是他早年常用

的名字。1910 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在堂长李元甫交给的一份表上填：毛润之，韶山人，17 岁。毛泽东曾以“润之”为名发表过《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第三个名字是“子任”。1910 年秋，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因仰慕梁启超(号任公)，便以“子任”为笔名。

第四个名字是“毛学任”。第五个名字是“学润”。第六个名字是“润芝”。第七个名字“永滋”。第八个名字“咏滋”。第九个名字“咏芝”。第十个名字是“允滋”。第十一个名字是“泳芝”。

这几个名字的来历都与杨怀中(即杨昌济)有关。据考证，毛泽东 1945 年重庆谈判时，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谈起：1915 年下学期，已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受杨怀中老师的影

响。杨是理学家,崇拜胡林翼。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先生,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毛答:“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之或写成“润芝”,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允滋”、“泳芝”。

第十二个名字是“二十八画生”。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发表过征友启事,落款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第十三个名字是“毛奇”。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还有个“毛奇”的外号。这个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国时一位赋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德文为 MOLKT,音译为毛奇),同学们给他取了个语意双关的外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当时毛泽东也常对同学说:“丈夫安为天下奇(宋代王延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还用“毛奇”这个名字写过些文章。

第十四个名字“毛石山”,是毛泽东 1922 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他在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毛泽东。”同年,他以此为名还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第十五个名字是“杨引之”。1927 年 7 月

至 10 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福建西部农村养病,曾化名“杨引之”,“引之”的谐音即“隐之”,这个名字寄托着他对久别远方的爱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

第十六个名字是“钟英”。1932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向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的报告手迹,落款署名为“钟英”。

第十七个名字是“杨子任”。在延安时,毛泽东给分别了 10 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还特地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用此名字不仅是为了故人,免得因与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的关系而遭迫害,也表达了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共勉,同时也表达了他和已故妻子杨开慧对他们共同尊敬的师长杨昌济先生无限怀念的深情。

第十八个名字是“李得胜”。1947 年 3 月,



●文史拾趣●

国民党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

第十九个名字是“事任”。1946年,53岁的毛泽东曾用化名“事任”。当时毛泽东不再对国民党抱任何希望,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毛泽东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事业的全部。

第二十个名字是“马任”。“马任”显然与马克思有关,这一名字显示了他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己任,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第二十一个名字是“自任”。这一名字表明了毛泽东自我加压、负重拼搏的人生理想。

第二十一个名字是“周石林”。湖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陈焕文会长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名、字、号,据资料,除‘毛泽东’外,毛泽东曾用过二十八画生,咏芝,子任、毛永滋、毛石山、李德胜、润之、周石林等。”

第二十二个名字是“润西”。第二十二个名字是“毛万山”。第二十五个名字是“赵东”。第二十六个名字是“国彬”。毛泽东曾使用过的这几个名字都记载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

·知识窗·

中国结 的来历和含义

中国结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装饰品,始于上古先民的结绳记事。据《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它作为一种装饰艺术始于唐宋时期,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开始给其命名,并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如意结”代表吉祥如意,“双鱼结”代表吉庆有余,结艺在那时达到鼎盛。



中国结的特点是,每一个结从头到尾用一根线编结而成,每个结又根据其形、意命名。把不同的结饰结合在一起,或用其它有吉祥图案的饰物搭配组合,就形成了造型独特,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传统吉祥饰物。



中国的岁时节日比较频繁,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清末时期,存在宫廷节令与民间节日习俗并存和相互渗透的现象。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沿用阴历,直到民国才与国际接轨,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历。然而公历的实行并没有改变千年来形成的岁时习俗,阴历与公历并存,岁时节日也呈现新旧更替的气象。

清末宫廷和民间节日习俗

晚清时期,宫廷里的节日有两个显著特点:满汉风俗杂糅、官方礼仪与民间风俗融合。满族宫廷逢年过节饮宴时要跳“莽式舞”,即早年满族民间歌舞,表演时众人皆拍手呼喊“空齐”二字以和之,又称“空齐舞”。八月二十六日为宫中节日,这一天大家都不吃肉,以生菜裹饭而食,亦不用筷子,以手代之,慈禧太后也如此。这是因清入关前,太祖努尔哈赤转战甚苦,这天以树皮充饥,满族人民为追念祖宗创业之艰辛,以此日为纪念日。

岁时节日 的变迁

满族入关前已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的主要节日春节、元宵节等,均与汉族相同。以满族皇室过春节为例。每年十二月中旬,与民间一样,官中也开始筹办年事。民间是“吃黄羊,要扫房”,官里的宫女、太监要清洗打扫皇宫,如同百姓年终扫除房里积尘。然后慈禧太后开列名单,名单上的人都得参加。除夕的早晨,太后率皇帝、皇后在宫中各处拜神佛祖宗。礼毕,参加辞岁人员中的

的女眷,络绎进宫,谒见太后、皇帝、皇后。至午后二时,咸集于殿,由皇后率领行礼,即为辞岁。除夕之夜宫中奏乐,直到天亮。皇太后和来宾们也像老百姓一样,以掷骰为乐。大年初一,宫里宫外均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接神之后,从王公至百官,均络绎入朝朝贺。正月初二为财神诞,民间照例致祭财神,鞭炮甚火,昼夜不休。官中也不例外,慈禧太后于清晨即上殿礼拜财神,官眷亦随叩。初三日是宫中人送礼的日子,均盛以黄盒,放在大院中,隆裕皇后进献自制的鞋及手巾、荷包,陈设第一排,妃嫔官眷各有所送。初四日为太后回赏之期,她视献物之厚薄以答之。对官眷,则每人各赏衣一件,银数百两。内廷王公大臣亦得获赐葛纱及画扇。初五谓之“破五”,破五

●文史拾趣●

之内妇女不得出门，官眷日侍皇太后博戏宴饮。至初六日，则王妃贵主以及各宦室等冠帔往来，互相道贺。

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节日风俗在具体事项方面还是有不少区别，但大方面还是相同或相似的。

正月初一为“元日”。各家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宵达巷。全家穿新衣，按长幼秩序，饮酒作乐。然后拜访亲友，谓之道新喜或拜年。路遇熟人，则作揖祝福“新喜纳福”或“恭喜发财”。北方人家，无论贫富贵贱，皆吃饺子，不吃米饭，取“一年平顺无口角”之意。南方则除夕煮好过年几天的饭，新年不再以生米煮饭，以示丰衣足食。

春分日，世家大族致祭宗祠，秋分也如此。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这天禁屠宰，祭文庙。各书塾设供，师生瞻拜。

冬至为朝廷郊天令节，民间不为节，只吃馄饨而已，与夏至吃面同，京师谚语：“冬至馄饨夏至面。”

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民间用饴糖、饼饵及清水草豆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焚化，送其上天，并求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至除夕始接神回位，再行供奉。

祭灶之后，渐次贴春联、门神，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春联用红纸，南方新丧之家，多贴黄纸春联，书写孝思之辞。民间认为门神有捍卫家宅平安之用。

十二月最后一天为除夕。士民之家，致祭祖宗，悬挂影像。黄昏后，全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散斗叶以为

乐。到亥、子之交，天色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稍睡，天已亮，爆竹在耳，家人叩贺，喜气洋洋。

节日在传统中国社会风俗中极其重要。祝祷，可寄托人们对新生活的良好愿望；馈赠，可增进感情；家宴，可增添家中祥和之气；祭祖，可教育人们不忘本等等。

民国后新式节日兴起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但立即遭到保守者的反对。阴历有二十四节序之设，农民为适时耕作，需要旧历。星命占卜之士认为生辰八字、干支属相等都是按旧历推算。于是民国年间，出现阴历与公历并存局面，节庆也因而出现混乱，如有的地方，一个节日过两次。

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许多新式节日、纪念日，都是有关国庆、国耻，或关系伟人、关系大事等。如国民政府时期的庆祝活动有：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7月9日国民革命誓师日、10月10日国庆、11月12日总理诞辰日。这5个纪念日，全国都要悬旗欢庆，国庆节党政军各界及各团体要举行庆祝会，会后提灯游行。3月12日总理逝世纪念日和3月29日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全国都要下半旗志哀。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教师节、商人节，由该团体举行纪念大会，由各党部派员指导。

民国时期，节日颇多，每个月都有节日，一个月内还不止一个节日。节日主要有几类：1. 政治性节日：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北平民众革命纪念、革命先烈纪念、学生爱国运动纪念

等。2.行业性节日:司法节、戏剧节、工程师节、记者节、商人节等。3.纪念个人或某类人群节日:童军节、青年节、廖仲恺先生殉国纪念等。4.国际性节日:国际母亲节、世界动物节、世界学生节等。

新中国的节日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节日以外,增加了许多新式节日,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些新式节日都很政治化。每年“五四”青年节,通过报告会等形式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七一”建党节,各级党组织举行纪念活动,其中一项重要活动为新党员入党宣誓。“八一”建军节,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举国同庆,首都和各大城市都要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国庆节还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仪式。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节日日益冷落,西方节日(暂称“洋节”)却日益火爆。1998年一份调查表明,洋节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分别为:圣

诞节(过节的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5%)、母亲节(42.5%)、情人节(37.5%)、父亲节(27.5%)。对万圣节、复活节、感恩节则很少有人记起或知道。

中国人过洋节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对节日来历一知半解,也不求甚解,更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如过圣诞节,并不是都到教堂里去观看宗教仪式,参加圣诞礼拜,也不是在家里围着圣诞树等待圣诞老人从天而降,而是三五好友平安夜在餐厅、酒吧聚餐,开派对、搞狂欢。过情人节则是情侣们互赠玫瑰花、巧克力之类以示爱。过母亲节、父亲节主要是孩子们给父母送鲜花或小礼品,做父母的要等孩子说明是父亲节、母亲节才明白子女送礼的意义。过感恩节取“感恩”之意,学生在这天给老师发短信或E-mail,感谢培养之恩,与西方感恩节的含义相去甚远。中国人过洋节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企业白领、公教人员、大中學生占多数。

(上接第47页)自己的,这已形成了制度。服务员一直按此规矩执行。外地同志来中南海吃饭,看到酒瓶上贴有符号名字的标签,感到很惊奇,经服务员解释,方知道了这个制度。

总理、副总理在中南海举行国宴时,也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举行国宴时,不上烟,不上白酒,不上易拉罐饮料,只上一些加饭酒和白干葡萄酒,饮料只上国产的配装饮料。

这种传统制度,已沿袭近六十年,在中南海还是代代相传,在提倡清廉和俭朴的今天,更加受到欢迎。

国外的“四菜一汤”

据报道: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宴也多是“四菜一汤”,而且菜量非常少。美国总统宴请贵宾的宴会,形式上非常隆重,但在饮食方面做起来竟还是“四菜一汤”。第一道是开胃食品——小碟冷菜;第二道和第三道是主菜:鱼和牛肉,最后一道是甜食,即水果、蛋糕、冰淇淋之类。欧共体各国首脑每年在布鲁塞尔聚会一次,东道主比利时宴请各国首脑时,更加“抠门儿”,只有冷菜和甜食。

无论美国或欧共体,都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办起宴席来,却如此“贫穷”。这里面的道理,颇值得我们去琢磨、思考。



朱元璋的“四菜一汤”

在朱元璋的故乡——安徽凤阳，流传着一首“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长治之安；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太祖（即朱元璋）廉政万岁千秋。”

朱元璋借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但是长年战乱却使百姓流离失所，灾荒连连。一些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出身贫苦、讨过饭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决心予以整治。

朱元璋虽然很想治一治这腐败之风，但考虑到一些做官者与自己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打下江山，面子上有些过不去，未免有些犹豫不决。马皇后见朱元璋终日愁眉不展，知道他的“心病”，所以向朱元璋直言道：“皇上英明，但我们不能得了天下而忘了百姓，何况载舟之水亦能覆舟……”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朱元璋听了连连称好。

古今中外的 “四菜一汤”

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处理完朝政之后说：“明日是皇后的生日，朕准备在皇宫设宴，君臣同贺皇后寿诞。”众官一听，无不欢欣。

吉日一到，百官争宠，备上贺礼，前来祝寿。当大家在宴席坐定后，朱元璋和马皇后步入宴厅，太监当即宣布开席。

当官吏们想着今日皇上不知会用什么珍贵佳肴进行招待时，上来的却是一盆热气腾腾

的红萝卜，百官顿时傻了眼。这时，只见朱元璋举起筷子笑着说：“萝卜为百姓之本，俗话说：萝卜上市，药铺关门。朕与皇

后愿大家百病全消，让百姓说：‘官家进了城，坏事不出门。’请大家不要客气。”说完，就带头大吃起来。百官见皇帝、皇后带头，不敢不吃。朱元璋边吃边举目四周，见有些不大动筷子的大臣，就问：“此萝卜烧得不好吗？”吓得百官不敢停筷。

第二道菜是“炒韭菜”。朱元璋说：“细细韭菜青又青，长治之安得人心。愿你们吃了这菜，使管辖地方的百姓安居乐业，久治长安。”说完又带头吃了起来。

第三道菜是两碗青菜。朱元璋又说：“两碗青菜青又青，两袖清风好臣相。”

最后上来一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明日月长。寅是寅来卯是卯，大明江山万年长。”百官不得不

装出高兴的样子连连点头。有的却感到大事不妙,禁不住额上出了冷汗。

这时,朱元璋把目光转向贺礼,脸色陡然一沉,说:“朱涛!”一个官吏慌忙跪下:“臣在。”“你这次贺礼是什么?说!”“是……翠表二领、玉镯两双、金佛八座……”“你年俸多少?此物何来?……拿下!”众官见皇上动了真怒,连本家侄子也开了“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朱元璋目扫那些脸失本色的官员们说:“你们的事,今日免了。这些贺礼全部作济账之用……今日是皇后寿辰,从朕做起,从小事做起,今后不论什么安排,最多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此律颁布天下,违反者,谁都可告,并有重赏。”

从此,“四菜一汤”在明初成为定律,有效地制止了“吃喝风”,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变了社会风气。好事自古多人敬慕,这首“四菜一汤”歌谣也随之广泛流传。

郑板桥的“四菜一汤”

相传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任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知县时,一个知府到潍县视察。这位脑满肠肥的知府大人是个有名的“饭桶”,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顿顿山珍海味,天天“三醉一倒”。

这天,厨师问郑板桥:“该做什么菜?”郑板桥想:“潍县是个穷县,自己又是一个七品芝麻官的穷官,拿什么来招待顶头上司呢?”半晌,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妙笔一挥,写下这样一份“菜单”诗:“青龙卧金滩,银卷颤又煽,一青拌二白,油酥天鹅蛋。另加一汤:门泊东吴万里船。”原来,郑板桥早闻知府大人是一位“美食家”。这位知府大人每到一地巡视,第一件事就是吃,而且吃什么必先递上菜谱,征得他的同意。

知府终于来了,他接过呈上来的“菜单”一看,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吃遍九府八十一县”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于是满心欢喜,这回可大饱口福、大开眼界了。

不一会,各种的菜肴陆续端上桌来,知府一看,连鼻子也气歪了。原来所谓的“青龙卧金滩”却是一盘“麻酱拌黄瓜”;所谓的“银卷颤又煽”是一盘“酸醋拌粉皮”;所谓的“一青拌二白”是一盘“小葱豆腐”;所谓“油酥天鹅蛋”,是一盘“油炸花生豆”。名称最文雅的汤菜——“门泊东吴万里船”却是一碗“鸡蛋汤”,上面还漂着半个蛋壳。

知府呆呆地看着,郑板桥却在一旁起劲地说:“大人您请!大人您请!”弄得知府哭笑不得。

据说,后来下级招待上级的“四菜一汤”,就源于清代郑板桥宴请知府的故事。

中南海的“四菜一汤”

周恩来总理在世时,无论是开国务会议、常务会议以及招待外地来京的宾客,还是招待运动员、艺术家,都坚持“四菜一汤”的标准,不准铺张浪费。

“四菜一汤”是1950年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如今,中南海、国务院仍然坚持这个制度。在接待来宾时,工作人员事先都讲这么一句话:“对不起,同志们,到我们这里吃饭是‘四菜一汤’,这是周总理留下的规矩,现在还要坚持。”许多外地来的客人,对此很惊讶!

在过去,每次国务院开常委会时,常吃“会议饭”,当时领导规定也是“四菜一汤”。为了节约开支,国务院秘书局曾经专门讨论过:常务会“会议饭”不上海味,也不供白酒,领导同志要喝酒的话,自己买酒放在餐桌上,在酒瓶上注明姓名,自己喝(下转第45页)

花木兰参军没必要女扮男装

《木兰诗》成书于 568 年,最早见于南朝僧人所编《古今乐录》,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木兰诗》成书之前,战乱连连,混乱不堪。493 年,北魏孝文帝迁都,由平城迁到洛阳,孝文帝改革鲜卑旧俗,主要是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语;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523 年,柔然(今内蒙古一带)等六地士兵发动起义,北魏与起义的柔然发生战争,到 534 年,北魏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此间发生了 12 年的战乱。这和诗中“同行十二年”的时间相符。

有人考证说,“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的权利的”,这种论调,违反历史

事实,先秦和两汉期间,女军的史实是很多的,根本没必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关于女军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尚书》,孔颖达疏:古人或以妇女从军。比较著名的是孙武训练娘子军的故事,孙武训练娘子军,左右领队的是阖闾的二姬,她们两人很不严肃,嘻嘻哈哈,孙武把二姬给斩了,娘子军才严肃起来。《墨子》和《商君书》中均有女军的历史事例。如《商君书》三军是指壮男的一军,妇女为一军,老弱为一军,《史记·田单列传》中田单把妇女编于行伍之间,编于士卒之间,说明当时妇女从军很普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包括柔然,女子直接参战的历史事例很多,这些可以充分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妇女参军并不是禁忌的,完全没必要女扮男装。

·知识窗·

“中彩”的来历

古代有一种竞猜游戏,用木头做成五个与现代骰子不同的骰子,它们不是六个面的正方体,而是长柱体。四个侧面有彩画,两面画着雉(即野鸡),另两面画着牛。顶的一面黑色,底的一面白色。游戏时,五个

骰子一起掷,如果掷出的五个骰子的画面一样,比如都是牛,就叫“中彩”,就赢钱。“彩”有大有小,全黑的最大,如果掷出了全黑,就叫“中头彩”,自然就赢最多的钱。

宋朝的『几乎赏』

南宋初年，金国四太子兀术挥军南下，所向披靡。宋高宗赵构一路败逃，金军跟踪追击，一直打到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赵构乘船逃到海上，金兵入海 300 里，追之不及而还。在退兵北归途中，又在长江大败阻击的宋军。然而，据宋庄绰《鸡肋编》记载，在经历了这场彻底的大溃败后，南宋朝廷居然新设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奖项——“几乎赏”。

当时，北宋刚刚灭亡，南宋朝廷在江南立足未稳，以前的典籍散亡殆尽，一切规章制度尚未建立，就靠前朝老吏凭借记忆来定规矩，不少老吏“临时徇私自便”。在江面上损失惨重的将领们乘机瞒天过海，邀功请赏，理由是“四太子几乎捉获”。朝廷呢，更是匪夷所思，居然采信了老吏们前朝有先例的胡言乱语，推出了“几乎赏”这个特制奖项。

其实，傻子都知道，“几乎捉获”就等于“没有捉获”，所谓的战功当然也属于虚乌有。可这个“几乎捉获”实在是很有诱惑力，皇上听了脸上有光，朝臣们听了心里激动。特别是在刚刚经历了狼狈逃窜的噩梦之后，这四个字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把人们那种三魂出窍、五魄俱散的心情，重新拉回到五彩斑斓的现实之中。

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方术之士便纷至沓来，声称可为之寻求不死之药。但这个世上哪有什么不死之药呢？于是这些人登山下海，神游一番归来，找出种种借口，说：“未能至，望见之焉。”(《史记·封禅书第六》) 结果秦始皇更是充满期待，“几乎赏”也免不了一发再发。

·知识窗·



汉代也有 兵马俑

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兵马俑像，是两汉时期雕塑中的重要门类。与秦代相比较，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变为写意。它不注重人物线条的比例是否准确，而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据汉代的葬制，唯有立下特等功勋的人才能享用兵马俑陪葬，而且还要得到皇帝的恩准。专家们经过计算发现，制作一套不同样的兵马俑需 9 组 73 件不同的模具。由此可见，这项工程是多么繁琐。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业务培训会召开

2009年12月16日至17日,西安市第二轮修志业务首次培训会在止园饭店召开,全市130多名修志工作者参加。此次培训会规格高,两名主讲者分别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联络处处长张英聘博士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方志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协会秘书长邱新立博士。

张英聘博士以“方志基本知识和第二轮修志概况”为主题,从方志的概念和起源讲起,分七个方面讲述了方志的基本特征、方志的体例、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新方志编修工作的起步与发展、第二轮新方志编修溯源、体例和存在的问题。邱新立博士以《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写为例,重点讲授了志书“篇目设置”、“资料收集整理”、“资料长编的编写”和“志稿撰写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的志书编纂知识。两位博士在

讲授中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大家对方志基本知识、修志工作流程、基本要求和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全国第二轮修志的概况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激发了大家对地方志工作的浓厚兴趣。

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对此次培训高度重视,参会积极性高、人员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许多参加培训的同志说:以前对地方志不太了解,通过培训既懂得了地方志的相关理论知识,也掌握了地方志的编纂要求和方法,受益匪浅,希望多举行业务培训,提高大家的修志业务水平。

会议期间,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协班子成员焦博武、史天社、王新中等到会就第二轮修志的有关情况与两位专家进行了交流,对本次培训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感谢中指组专家对西安市地方志工作的支持。

西安地情网正式开通

2009年12月28日,西安地情网暨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数据库开通仪式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举行,市政府副秘书长郭艳文到会点击网站开通并讲话。

西安地情网(<http://www.xadqw.cn>)提供的信息资源包括:西安概况、西安大事记、西安风情、政务公开等内容。容纳近3000万字的信息容量,是社会各界了解西安地情信息的一个崭

新窗口,具有准确性、权威性、官方性等特点,成为政府面向公众、服务公众的信息主渠道。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全方位了解历史和现代的西安。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数据库(<http://ve.xdwy.com.cn/difangzhi>)已收入原版、原貌《西安市志》以及1993年度至2007年度全部《西安年鉴》,2008年度、2009年度《西安年鉴》也正在加快录入过程中。

长寿的雅称



喜寿:指 77 岁。因为汉字草书中“喜”字看似七十七,故借以指 77 岁。

米寿:指 88 岁。因为“米”字拆开来就成了八十八岁,故借此指 88 岁。

白寿:指 99 岁。因为“百”字去掉上部的“一”字为白,而百少一为九十九,故称此指 99 岁。

茶寿:指 108 岁。因为“茶”字的草字头看似二十,余下者拆成“八十八”,二者相加为 108。故借此指 108 岁。

上寿:指 90 岁以上者。

中寿:指 80 岁以上者。

下寿:指 60 岁以上者。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的来历

春秋时,晋国梗阳(今山西清源县)有一桩案件,被告担心输掉官司,打算对正卿魏舒行贿,请他帮忙将官司打赢,魏舒“将许之”。

大夫阎明与叔褒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和不安,商定一起劝阻魏舒。阎明说:“魏大人向来清廉,美誉传遍全国。如果这次接受了贿赂,他的名声将毁于一旦,此事万不可为。”说罢,二人便一同去拜见魏舒。

他们到魏府时,魏舒正在进餐,见二人来访,便邀请他们一起用饭。席间,阎明以三声叹息引起了魏舒的注意。魏舒说:“人们常说,吃饭能够忘忧,可你为何三次叹气呢?”阎明见时机已到,便深沉地说:“我是小人啊,心太贪。眼前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我仍担心不够

吃,此为一叹;吃的时候我又问自己,主人的赐食怎么可能不够呢?我有什么可顾虑的!此为二叹;现在主人进食完毕,我也该量腹而食,适可而止,不可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此为三叹。”

魏舒听了这番话,明白了阎明与叔褒的用意。于是,他辞绝了被告的贿赂。

阎明说的“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本是讽刺魏舒不可受贿之语。后经改造,南朝时作“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用以指某些人以自己卑鄙的心理,度测品德高尚者的胸襟。此语随语言的发展,最终成为如今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词。

我国最早期报纸的

投递与发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唐朝开元年间,在长安出版的《开元杂报》,是第一份用纸印刷的报纸。投递这种报纸的机构,当时叫邮驿,投递人员为唐朝兵部军卒。这种专门携带“邸报”和公文的军卒,腰束革带,别挂悬铃,骑着快马传邮,行人听到铃声都远避路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后,报纸普遍采用雕版活字排版印刷,发行量不断增大,但仍由兵部负责投送。清王朝建立后,由于战争频仍,交通阻塞,北京出版的京报在江南一带要一个月后才能收阅。当时民间通信也十分不便,信件亦往往由传递京报的专差代抄,并付一定的报酬。到了清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报纸、信件投递才脱离兵部,由邮传部办理。

1900年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我国各类报刊陆续创办,它们的发行机构是北京宣武门外琉璃厂铁老鹳庙胡同陆续出现的六大报房,字号是:聚兴、聚恒、聚升、合成、信义、集文,聚兴字号最大。这些报房控制在京各报的发行权。各报房都雇有报夫,一律穿蓝布长衫,肩上搭一条蓝布长袋,内装当日京报,健步如飞,分送各衙门、官员府第、大商号、钱庄等订户。每月订费两吊钱。当报夫的

一般都要身强力壮、善走,所以报夫中山东大汉最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发行投递人。在苏州与上海间尚未通行轮船和火车时,《申报》向苏州投递,只能靠一种“脚划船”赶送。这种船小且轻,桨又多,船中只能容一至二人。船行驶时不但手要划桨,脚也要用力划船,故称“脚划船”。这种以船送报的方法,在当时还算是“特快”投递呢。

1911年,北京各报社联合在琉璃厂南柳巷永兴寺开办了一个报纸联合发行处,雇人送报。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刊发行处。他们通过报贩,层层批发零售,有的直接递送订户,有的沿街叫卖,彻底打破了原来报房的垄断发行。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展,发行处还雇用了一些穷苦的孩子卖报,由此产生了我国第一批报童。

我国早期的报社,还不懂得将广告收入作为办报经济的来源,又不能像官办报纸那样强行摊派,为了维持下去,他们想出了种种推销办法。如1903年我国曾出版过一种小型报纸《觉民报》,该报以传播时事商情为主,每五天出一期,每期末页附有彩票一张,印有号码,抽中者可得古画或珍本图书,如不要实物,也可换领奖金。后来,这种抽签兑奖的办法被商人用来推销商品,以至尚袭至今。

如何区分佛教的服饰

根据佛教的制度，比丘衣服有大中小三件，一是用五条布缝成的小衣，我国俗称为五衣，是打扫劳作时穿的。一是七条布缝成的中衣，我国俗称七衣，是平时穿的。一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我国俗称祖衣，是礼服，出门或见尊长时穿的。三衣总称为袈裟(kasaya)。

袈裟本是一种颜色的名称，因为佛制僧人必须穿染衣，避开青黄赤白黑五正色，而用一种杂色，即袈裟色。我国旧译袈裟色是赤色。据我国佛典记载，佛教在印度分了部派后，各部派衣色便有了区别，有的是赤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青黑木兰色。但据六世纪印度来华高僧真谛法师说，各部派衣色实际都是赤色，所谓青黑木兰，仅足些微的差别。现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泊尔诸国的僧服都是黄色，仅有深浅的不同。

我国汉族僧人的袈裟，祖衣是赤色，五衣七衣一般都是黄色。蒙藏僧人的袈裟，大衣是

黄色，平时所披的中衣近赤色。北方气候寒冷，僧众三衣不够，所以我国僧众在袈裟里面另穿一种常服，这种常服是就古代俗人的服装略加改变的。

常服的颜色，明代皇帝曾作过规定，修禅僧人常服为茶褐色，讲经僧人蓝色，律宗僧人黑色。清代以后，没有什么官方规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见月律师重兴后，一般僧人常服均为黄色。缅甸佛教徒特别忌穿黑衣，因为在缅甸古代曾有一种邪教僧人穿黑衣，多行非法之事，后来严行禁绝。蒙藏教徒也忌穿黑色衣服。



“奏折”之误

在如今的一些宫廷影视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见某某皇帝这样问身边的太监：“今天可有人提交奏折？”这里的“奏折”，其实并非真正历史上的“奏折”，它的正确叫法应该是“题折”。

在《清沿明制》第三卷中记载：“臣工奏事，公事用题、私事用奏，题折用印，奏折不用印。”群臣上报事情，关于公事用“题”，关于私事用“奏”，“题折”用印，“奏折”不用印，这里的“印”字指的是“印章”。就是说因公事上书的官员和皇帝都要在这文书上盖印的，这种正规的文书就叫“题折”，至于私事，那就不用

盖印了，看过之后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这种不正规的文书叫奏折，是非常保密的私事上报材料，多为暗中检举揭发或替人说情之用，都由皇帝亲自接收审阅，所以尽管某些太监总管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但也是不可能看见奏折中的内容的，更别说皇帝在早朝时还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他们今天有没有人提交奏折了。

以康熙为例，他之所以成为数十年的明君，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奏折”的作用，因为群臣当朝时不是每个人都敢讲真话、讲实话或私人话的，而“奏折”则让他了解到更多平时官员们不敢当众讲的话。

制约二轮志书整体质量提高 的三个关键问题

◎ 高金山

理论缺失、编纂随便、指导不力是影响和制约第二轮志书整体质量的关键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并不被方志学界所关注,致使第二轮志书整体质量一直没有较大突破。其中:理论缺失是第二轮志书编纂以来表现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对“志”这一概念的认识最不严密,直接造成了对编纂工作不利的后果。概念一般存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的内容,可是在目前方志理论中,“志”这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这里的“志”是由志书、年鉴组成的,概念明显出现外延。也就是说,研究“志”需要从志书、年鉴两个角度去进行,但是理论界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来满足志书、年鉴理论指导编纂的需要。“志”概念内涵的改变,影响着方志理论的科学性。“志”一方面包含着过去强调的“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另

一方面需要考虑这七种体裁是否适用年鉴;同时还要考虑地方志书中的“志”与地方志书七种体裁中的“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志”概念的复杂化,恰恰没有得到方志理论工作者的重视,结果造成用旧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进一步影响志书质量。年鉴归入地方志,给方志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理论工作并没有跟上去,结果造成年鉴借用方志理论,方志理论又承担起指导年鉴的任务。其次,文体研究不到位问题十分严重。述、记、志、传、图、表、录是地方志书的主要体裁,但是理论界对七种体裁的本质、形式、内容等存在着研究不到位情况,这种理论缺失也在影响着志书质量。第三,地方志强调以类系事,理论界很少涉及“类”的研究,诸如类的特点、类的划分标准、类与类的横排竖写、类与类的先后次序、类与类的关系等等,以致造成某些编纂者不知如何以类系事。

(摘自《中国地方志》2009.12)

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创新谈

◎ 王登普

现在方志界有人过分推崇条目体,而对于章节体,特别是对于志书横排竖写的基本格局提出异议,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笔者认为,自民国时期前辈方志学家创造了章节体志书,经过首轮新编志书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这种章节体架构,以志为主体,坚持志、述、记、传、图、表、录诸体综合运用,共存互补,融于一志的体裁模式,是基本上能满足承载地情需要的。特别是以时有序纵写始末的志体,对记载事物发展过程,系统反映地情资料的历史连贯性,是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二轮志书要与时俱进,可以根据新的记述内容适当运用新的体裁(如条目体、史志结合体、专题记述、调查报告、特载、考、略等等),从而使志书体裁更加丰满,适应承载地情的多方面需要,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章节体,否定以志为主体的横排纵写基本格局。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创新的关键是把握好所要容纳的内存,研究地情是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创新的前提条件。全面而准确地记述地情是修志的根本任务,衡量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创新的标准之一应是看这个篇目是否能恰当地记述地情。所以在拟定第二轮志书篇目之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地情、把握地情。要从地情实际出发,寻找内容与形式的最佳契合点;设计出具有地情特征的个性化的篇目,而不是脱离地情实际去寻找框架、体式和体裁,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设计出创新的篇目来。

(摘自《中国地方志》2009.9)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唐 李贺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这首诗是元和八年(813年)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其时唐王朝国运日衰,藩镇割据,兵祸迭起,民不聊生;而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报国无门,处处碰壁。诗人有感于此,因而借金铜仙人辞汉的史事,来抒发兴亡之感、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它设想奇特,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词句奇峭,而又妥帖绵密;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特别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的酸苦凄惨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